

红旗

一九七四年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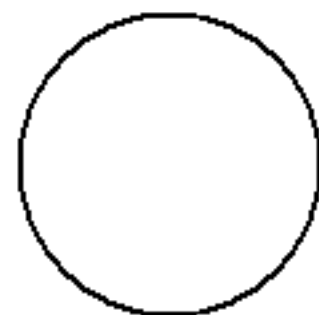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 目 录

思想评论



- 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池 恒 (5)
-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薛 仑 (9)
- 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黎 新 (14)

认真看书学习 抓紧批林批孔

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

-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一点体会.....武振轩 (18)

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

-罗思鼎 (25)

-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燕 枫 (34)

《三字经》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 剖析《三字经》的两个增补版本

-合肥市杏花村公社 方玉荣 李 敬 (40)



批“半部《论语》治天下”.....卞石中 (43)

支持新生事物 发展大好形势

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风庆”轮党支部 (49)

关键在于端正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

——四川汽车制造厂的调查报告..... (56)

两种经济制度的鲜明对照.....夏力之 (60)

演冬子,学冬子,做党的好孩子.....祝新运 (65)

搞好技术革新 走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

发展工业一定要开展技术革新.....宫效闻 (67)

技术革新必须依靠工人群众

.....北京第一机床厂党委会 (73)

新厂也需要搞技术革新.....天津市第一石油化工厂党委会 (77)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

——上海中国电工厂的调查报告..... (81)

杂文: 呖语.....阳 戈 (86)

☆十一月一日出版☆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毛主席语录

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毛主席语录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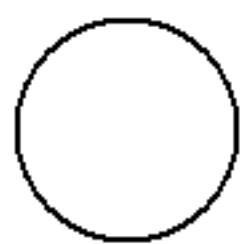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思想评论

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



池 恒

一分为二，即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在继续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继续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我们必须善于具体地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并且要看到它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这也就是说，要搞两点论，不要搞一点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某些现象，看不见或抹杀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否认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些都是同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和宣传唯物辩证法，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毛主席还提出，要在党的各级地方



委员会上谈一分为二的问题，使大家逐步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对于毛主席这些指示的领会也越来越深刻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凡是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我们就能取得胜利；凡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违背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我们就要犯错误。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说明：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毛主席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一分为二，就能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不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政治思想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看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看到反修防修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长期性，这决不会因为进行一次或几次大的斗争，阶级斗争就可以结束。如果不这样认识问题，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有张有弛、曲折前进的。它象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阶级斗争高一阵的时候，并不表明阶级敌人力量的强大；阶级斗争低一阵的时候，并不表明阶级斗争的熄灭。如果不注意到阶级斗争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形式，就是不懂得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得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不断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加深对它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以便适合变化了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为了开历史倒车，搞反革命复辟，总是要尊儒反法，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动的思想武器。有尊孔必有反孔，反孔总是同尊孔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开展对修正主义、对孔孟之道的革命大批判，是我们当前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重大任务，也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坚持一分为二，我们要从整个民族文化遗产中剔除孔孟之道的糟粕，彻底批判儒家复古、倒退、卖国的反动路线，同时，要



对法家的著作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分析，肯定法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作用，恰如其分地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研究历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搞形而上学，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古为今用的方针。我们要使法家著作的研究，使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研究，真正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的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受到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热爱和拥护。敌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只是一小撮。这种分析和估计，符合实际情况，是我们需要而且能够团结大多数的客观基础。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加以正确处理。对自己，对同志，都要一分为二。这样，才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绝大多数人的觉悟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刘少奇、林彪的分裂主义从反面深刻地教育了人们懂得维护团结的重要性，运动中的许多经验也反复证明了革命大联合的必要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大多数，就能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们讲团结并不是否认斗争。团结是从斗争中来的。如果不揭露和批判刘少奇、林彪这些机会主义头子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就不可能分清路线是非，弄清思想，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也不可能今天的的大好形势。对少数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或多或少犯有错误的人，把他们的问题搞清楚，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有利于他们的进步，有利于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所以，我们既不能因为强调团结的重要而否定对错误路线、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斗争的必要，也不能因为这种斗争的必要而否定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我们必须防止类似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或者“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掌握一分为二，才能正确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的基本路线，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坚持“鞍钢宪法”的各项内容，纠正不正之风。这些都包含着思想和政治路线上的斗争。阶级敌人往往妄图通过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以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从反面说明，我们必须搞好批林批孔，认真加强对生产的领导。抓革命、促生产，还必须正确处理好生产领域内的各种发展关系。根据“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好生产计划，既符合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农业发展了，轻工业发展了，就会有更多的生活品，更多的积累，就可以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外，如大、中、小，农、林、牧、副、渔，等等，它们都是互相依赖、互相对立、互相促进的，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每一个革命干部，都必须具备对于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这个两分法的辩证思想，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看到革命的大好形势，肯定工作中的成绩，这对于我们坚定必胜的信心是非常必要的。解放以来，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用歪曲和抹杀大好形势的手法，妄图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对此我们已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还要看到前进中还存在着困难和障碍，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这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继续革命，继续前进。

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不很难，关键在于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实际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到处都有辩证法，如果不认真看书学习，从理论上提高自觉性，对实际生活中的辩证法就会视而不见，更谈不上自觉地运用一分为二解决实际问题。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必然会歪曲辩证法。所以，学习唯物辩证法还必须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我们一定要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真正变为自己手中的武器，使它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强大的威力，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薛 仑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保证党对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进行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是进一步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需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八年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除了党内的极大隐患。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广大党员和干部经受了考验和锻炼，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党的各级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巩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了进一步增强。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一片大好。为了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把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只有依靠党的坚强领导，才能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地、稳步地去夺取新的胜利。

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从组织上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了实现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历史任务，必须用统一的纪律把全党组织起来。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我们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是因为有一条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同时，也是与全党坚决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保证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分不开的。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加强党



的一元化领导，要进一步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要做到全党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愿望，全体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的组织都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高级领导机关，尤其要这样做。一九四八年，毛主席曾经强调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重温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于我们警惕上述现象的产生，自觉地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非常必要。

进一步发挥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方面。毛主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国家机关以及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是党根据革命斗争需要而建立的，又是党联系群众、领导群众的桥梁。在这些部门和组织中工作的党员和革命分子，是党派去工作的，要自觉地把自己所管辖的单位，包括自己的一切行动，严格地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任何部门、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向党闹独立性，不能离开党委另搞一套，更不允许凌驾于党委之上。如果否认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把二者的关系看成是平行的，甚至颠倒过来，那就势必削弱以至取消党的一元化领导，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危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竭力颠倒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关系，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一伙大搞多中心即无中心，在他们把持的部门大搞独立王国，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时刻摆正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关系。

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的组织来实现的。在一个地区，要由那个地区的党委会对所属各级党组织和其他革命组织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这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说过：“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



的党的委员会”。在一个地区，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委会，是那个地区领导一切的指挥部。没有各级党委会的正确领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因此，各个部门，各种组织，都要自觉地维护地方各级党委会的正确领导，不能以任何借口割裂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会的关系。党委也要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发挥党员和所属党组织的作用。当然，地方各级党委会的工作，也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积极地实事求是地帮助党委会改正错误，以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一切真正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必须从思想上牢固地树立党的观念。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二十五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反复证明了一条真理：“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摆正党同各个方面的关系，摆正党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能得到顺利贯彻，革命就发展，斗争就胜利；削弱或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受到干扰，革命就要遭受挫折，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也可能丧失掉。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以无限信任我们党，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正是基于这一铁的事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的威信更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党的观念进一步增强了。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竭力破坏党的领导的流毒的影响，以及社会上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有的同志没有树立坚强的党的观念。在少数党员中，还存在自觉不自觉地向党闹独立性，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群众路线，或者对党的政策、决议、指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等情况。这些由缺乏党的观念而出现的错误倾向，都在必须克服之列。我们应该向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增强党的观念的教育和执行党的纪律的教育，使大家都牢固地树立党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使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自觉地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于各级党委会本身来说，要求形成一个坚强而统一的领导核心，建立起一个团结一致的、坚持原则的党的委员会。没有这一条，一



元化领导就是一句空话。

毛主席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毛主席的指示，对于党委会内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也是完全适用的。党委会作为党的某一级领导机构，要想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朝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去战斗，去建设，就必须保持本身的高度集中统一，使党委“一班人”动作整齐，步调一致，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在党委会内部，不论书记或委员，都要自觉地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搞“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坚持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反对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党委会“一班人”是根据党的事业的需要，按照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被选进党的领导机构的。尽管他们来自各个方面，党龄有长有短，斗争经历各有不同，一经参加了党委的领导班子，担任党所分配的一定的领导工作，就更要以党的利益作为衡量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的唯—标准。要用无产阶级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对自己担负的工作必须坚守岗位，努力做好，对阶级敌人分裂和破坏党的团结的阴谋，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为了使党委会能够步调一致地去实行一元化领导，书记和委员之间互通情报，交流情况，取得共同的语言，并在工作中相互谅解，相互支持，主动承担责任，这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实践说明，党委会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或意见分歧，只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彼此都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出以公心，完全可以及时解决，从而使党委会的战斗力的提高一步。在这方面，书记应当带头做出榜样。在党委会内部，某些同志在工作中可能犯过错误甚至犯过大的错误，不要嫌他们，而要团结他们共同工作。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不是坚持错误而是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宝贵传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必须同一切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倾向作斗争。党委会要敢于坚持原则，反对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否则就是放弃了领导责任。我们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时又要坚持党的原则，不倦地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指导群众的革命斗争。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对于来自下级机关和群众的意见，凡属正确的，要积极支持，热情鼓励，认真提倡；凡属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进行批评教育。对于阶级敌人的进攻，必须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把他们揭露出来。**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实行这个原则，是为了保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它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完全一致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实行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进一步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统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行动，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在前进道路上即使出现一些缺点或错误，也不难纠正。各级党委会必须把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作为最主要的工作来抓，抓紧抓好。一定要象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善于把党的路线和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学会这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广大群众和干部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焕发出来的冲天革命干劲，投入到完成毛主席、党中央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中去。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按照党的章程，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模范，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我们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去发展大好形势，发展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



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黎 新

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这是革命的大局，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继续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以及各条战线的革命同志，都必须继续提高路线觉悟，为维护和加强革命团结作出新的贡献。

毛主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分显示了革命团结的巨大威力，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刘少奇、林彪搞分裂主义的危害性，体会到维护革命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团结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团结起来，才能保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起来，才能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我们正在进行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伟大事业。这全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干社会主义，除了党的领导和路线正确之外，动员群众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讲团结，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干得好。

团结离不开斗争。革命团结是在党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同阶级敌人作斗争中实现的，是在同错误路线、错误思想和分裂倾向的激烈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只有团结而无斗争，就不能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就不能组织起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们要又讲斗争，又讲团结，把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处理好。

在我们的社会里，拥护和热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群众是大多数，而敌视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敌人则是极少数。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战胜国内外的敌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自己的阶级，团



结自己的同盟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是胜利的根本保证。建国以来，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伟大斗争，特别是进行了四次重大路线斗争，揭露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分裂党、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每一次斗争都教育了广大党员和群众，团结了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使党更加纯洁，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搞分裂、不搞团结，之所以没有好下场，因为它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团结，反对分裂，团结起来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人心所向，党心所向。阶级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我们要自觉地坚持团结自己、打击敌人这个基本原则，把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深批透，不给阶级敌人有任何分裂革命队伍的可乘之机。

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深刻地概括了人民内部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并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由于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社会地位和世界观的不同，党内、革命队伍内部思想上行动上总会有矛盾，永远不会绝对一致，永远需要批评和斗争。“无差别境界”是永远不存在的。我们的方针，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人民内部矛盾有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加以具体分析。有的是属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分歧，是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例如，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等等。对这种争论，必须坚持原则，开展批评和斗争，分清路线是非，矛盾才能得到解决。看不到人民内部存在着这种原则分歧，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在路线问题上搞调和折中，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团结的。至于群众中对某些问题的争论和分歧，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少讲别人的缺点，不要抓住枝节问题纠缠不放，以至无限上纲。有些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也应以革命大局为重，求大同，存小异。在不损害马克思主义重大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大家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可以放弃的意见，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做，我们就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对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或多或少犯了错误的同志，处理好团结和斗争的



关系，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大多数的重要问题。这些同志犯了错误是不利于革命，不利于社会主义，但他们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又是可以或可能改正的。对于这些同志，我们既要有团结的愿望，又要有为实现这个愿望而开展必要的斗争，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毛主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包含着团结和斗争这两个方面，我们应当认真执行。

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在问题基本弄清以后，站出来重新投入新的工作，这有利于他们在斗争实践中继续改造自己，也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对他们的错误的批评和斗争的否定，恰恰相反，正说明了这种批评和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错误的同志就会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在这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中，经过革命群众的批评和斗争，才把他们从修正主义的泥坑中挽救出来，使他们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正如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明了他们继续革命的方向，是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批评与斗争去掉了他们身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灰尘。这种体会能够转变成继续革命的动力。我们只要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就能促进犯错误的同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新的战斗中为党为人民立新功。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些单位、地区的群众在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揭发和批判了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以及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这是很好的事情。各级领导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是处理好团结和斗争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对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是他们的权利，反映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体现了他们对领导的关心和爱护。对各级领导同志来说，自己有了缺点、错误，群众起来揭一揭，有什么不好呢？这可以帮助我们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热情欢迎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对他们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要着重从思想上、路线上要求自己，检查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广大群众，一定要做好革命团结的工作，对不良倾向要敢于和善于提出意见，不能放任不管，更不能支持一部分群众，压制另一部分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分裂革命队伍，这个教训应该深刻记取。每个



领导干部都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特别是正确对待给自己提出过批评的群众，坚决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决不允许打击报复。这样做了，我们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

处理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要坚持两点论，不搞一点论。团结和斗争是对立的统一，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这种片面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我们党反对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又产生了王明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样使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我们党反对和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到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出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又回到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那里去了。这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所推行的一套，都是同毛主席提出的“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根本对立的。在对待党内斗争的问题上，刘少奇、林彪一方面鼓吹“党内和平论”、“中庸之道”，一方面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根本对立的。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指出：“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我们要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还要注意到可能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只讲斗争，否认团结，或者只讲团结，否认斗争，这两种倾向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上都是把团结和斗争这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割裂开来，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其结果是殊途同归，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不利于革命团结，不利于党的任务的实现。

能不能处理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坚持哪一个阶级的世界观的问题。我们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切实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革命大团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朝气蓬勃地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认真看书学习 抓紧批林批孔

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一点体会

武振轩

虚心调查研究，正确估计客观情况，采取恰当措施，以掌握主动权，这是毛主席在许多军事著作中反复阐明过的光辉思想。毛主席这一思想，把战争的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军事上的具体运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努力领会和掌握毛主席这一思想，对于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刻揭露其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如何估计客观情况，处理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党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经常斗争的一个问题。机会主义者不懂得“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不懂得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战略战术的方针原则，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正确估计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毛主席在许多军事著作里，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时，总是要说明这些原则同客观情况的辩证关系，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在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错误和危害。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吸取经验，要“虚心



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从战略的方针到战役的部署，乃至每次战斗的进攻或退却的时机、地点，兵力的配备，预备队的使用，突击方向的选择等等处置措施，都要适合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不仅要学习毛主席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要学习毛主席在制定原则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分析客观情况，并努力应用于自己的行动中。

虚心研究和正确估计客观情况，努力使主观符合客观，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运用这一原理来指导革命和战争，不仅为我们党制定了各个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还制定了各项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其中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略防御中的“诱敌深入”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战略上的内线的防御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进攻的速决战，和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的具体方针；解放战争时期，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方针和“十大军事原则”；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所有这些，都是从正确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和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人力人心、地域条件等客观情况中产生的。这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建立在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基础之上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具体应用和重大发展。

毛主席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毛主席这一段分析，深刻地指出了正确的部署产生的认识过程和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不但对于任何一个正确的军事部署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正确的政治、经济部署和其他工作的部署，也是必要的。历次机会主义



者用于战争中的所谓战略战术原则，之所以是错误的，不免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一认识情况的过程，陷入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路线的所谓“新原则”、“正规原则”，就是这种唯心论和机械论相结合的产物。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林彪的所谓战略战术，诸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对革命前途右倾悲观，反对建立红色政权，主张实行流寇主义式的“流动游击”，后来又追随王明路线，主张以堡垒对堡垒的所谓“短促突击”，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打硬拼硬的正规战的所谓“教训”和“经验”，以及解放战争初期，提出同毛主席军事路线相对抗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其基本特点也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这些东西不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正确估计的基础之上，而是凭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制造出来的，因而完全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用林彪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这些所谓“战术原则”，是凭他“联想力强”和“编串子习惯”，今天“想”一个，明天“想”一个，所“想”出来的。这是他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自我暴露。

正确估计客观情况，主要的是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包括与各方相联系的各种情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虚心考察和研究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诸因素的内部联系，找出其固有的规律，做出正确的估量，由此而制定出适合这些情况的方针、计划和战略战术，并运用这些于自己的行动，这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途径。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和胜利，力避被动和失败。主动和胜利从何而来呢？“**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凡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即使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只要能够正确地估计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那么，“**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相反，如果对客观情况作了悲观的估计而采取了消极的处置，或者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而采取了冒险的处置，即使处于优势和主动，也不免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遭受挫折乃至失败。中国革命战争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历过主动和被动、胜利和挫折的锻炼和考验。艰难曲折的战争道路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双方的情况，采取了适合当时当地情况的战略战术原则，战争就胜利，革命就发



展；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不符合客观情况的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那么战争就失败，革命就受损失。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之所以经过艰难曲折而终于取得了胜利，正是由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战胜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统一，采取了适合客观情况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正确的战略和战术的原则。

为什么有些本来可以打胜的仗，结果打败了，本来可以做好的工作，结果做坏了？究其认识根源，就在于主观指导不适合客观情况。两军相争，一胜一败。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得当；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所谓指挥得当，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决心以及对各种情况变化的处置，都比较地合乎彼己双方的情况，都比较有利于己而不利於彼。毛主席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这就需要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并根据情况采取恰当的处置。打仗是这样，做工作也是这样。渔人撒网，要看清水的深浅、水流的速度和有无障碍；农民种庄稼，要根据土质、种子的性能、季节的变化等情况采取措施。我们指导革命运动，从事革命工作，也必须了解这个运动、这项工作的实际情况，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单凭主观愿望来确定工作方针。总之一句话，工作要求比较地会做，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主席指出：在我军战争史上，“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这两种偏向都是没有正确估计客观情况，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前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敌人，而后者，则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革命力量。毛主席历来提倡要当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智勇双全，就是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审时度势，处理问题，既不被其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也不为自己一时的顺利而轻敌，能够“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之所以不免碰壁，是因为他们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站在



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尊重客观，不从实际出发，不知道和不愿意对敌情进行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周密的思索，而是把自己的计划和行动建立在主观主义的基础之上。其结果或者一开始就搞右倾投降主义，或者从冒险主义走向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最后归于悲观者一路。这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过证明的。林彪鼓吹“不要怕情况不清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猛打猛冲”，甚至胡说什么“完蛋就完蛋”。这正是冒险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无知妄说，是毛主席所批判过的那种**“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做法的最后结果，必然是陷入军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

要正确估计客观情况，使主观符合客观，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客观事物是千差万别的，战争情况包括敌我双方的各种因素也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条件，不同的作战对象都有其不同的情形，构成战争的特殊规律。战争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实际，就要研究这些不同的情况，研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下，战争的特殊情形和特殊的性质。这样，才能够采取和战争情况相适应的政治和军事处置，实施正确的指导。**“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拒绝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不从具体情况中间找出具体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办法，如果用于指导工作，就会使工作做坏，用于指导战争，就会要打败仗。这是为历史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战争形态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我军之所以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疯狂“围剿”，而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其原因就在于前四次是在毛主席的领导或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影响下，采取了符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战略战术原则，而第五次则是机会主义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采取了不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处置措施。毛主席不仅具体地分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既不同于古今中外一般战争，也不同于苏联革命战争和中国北伐战争的四个特点，制定了与这些特点相适应的正确战略方针和原则，而且在各个战役指挥上也是针对不同情况，依据不同的敌势、我



势、地势，采取了不同的作战方法。因而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机会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统治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王明路线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林彪追随王明路线的“短促突击”，都是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军队改变其军事原则的情况下，王明路线却不因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相反却回到一般正规战争的“老套”上去，采取所谓“全线出击”、“分兵抵御”、“处处设防”、“短促突击”，以期“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正好符合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需要，帮了敌人的大忙。

“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只有对矛盾的双方的依赖关系、斗争的情况，以及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发展及其与外界事物的联系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把握事物本来的辩证法，找到解决矛盾的具体的办法。在抗日战争中，为什么要执行战略上内线的防御的持久战，战役或战斗上外线的进攻的速决战？为什么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通过对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的强弱，国度的大小、人口的多少，社会政治的进步退步，国际上的多助寡助等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为我们作出了科学的解答。“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看不到中日双方各自都存在诸种长处和短处这种互相矛盾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亡国论”者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看不到或不愿意看见中国的进步和多助以及日本的退步和寡助，只提强弱一点，并把它夸大为全体，“速胜论”者则不敢承认敌强我弱的事实，或把我之长处夸大到离开了真实的情况，都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经验，包括解放区的扩大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证明了毛主席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宣告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彻底破产。

能不能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说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在我党的历史上，对于客观情况的分析和阶级力量的估量，为什么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结论呢？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看问题的方法就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结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就不一样。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伟大、最有远见的阶级。只有



站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用这个阶级的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使主观认识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从而得出正确的估量。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在每一个历史关头对于敌我形势的分析，对于发展趋势的预见，之所以是正确的，并由此而提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原则，就是因为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机会主义者之所以对革命形势产生消极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估计，并由此而提出右的或“左”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决定的。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林彪总是过高地估计反革命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人民的力量，一贯右倾。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执行了王明路线，抗日战争时期，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规战争上，同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呼应，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毛主席作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伟大部署的时候，林彪还是看不到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局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显著变化和东北战场的大好形势，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反对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敢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这是林彪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和反动世界观的大暴露。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时，曾深刻地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样，就能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就能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科学分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和特点，不断使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因势利导，不断夺取新的胜利；就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好革命工作，永远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 和卖国主义的斗争

罗思鼎

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儒法两家不仅在守旧还是革新的问题上，而且在面对我国北方辽和西夏贵族统治集团发动的掠夺性侵略战争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法家坚持了爱国主义的路线，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儒家则挂起了卖国主义的降旗。可是，从宋代以来的道学家，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无不歪曲历史事实，吹捧司马光卖国有功，攻击王安石爱国有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王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性质，这对于划清历史的和现实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界限，彻底批判林彪的卖国主义路线，是完全必要的。

—

北宋中叶，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发动了一次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次变法证明，王安石是我国封建时代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毛主席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在北宋的历史条件下，划分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界限，就看他面对我国北方的辽和西夏反动统治集团的侵略威胁，是主张抵抗还是实行投降。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特别是北方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政权和西北部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对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辽和西夏的人民后来同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在当时，辽和西夏是带有严重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军事政权，它们不断向中原农业地区发动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对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其中受害最深的是北宋的劳动人民，他们既受到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又常遭到契丹贵族集团的武装掠夺，在这双重压迫下，过着水



深火热的生活。正如王安石所形容的：“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①因此，北宋广大劳动人民坚决主张抵抗。“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僮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②他们是何等地蔑视辽和西夏的武装侵略，表现了坚决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法家从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立场出发，也坚决主张反抗辽和西夏的侵略。他愤怒地指出，宋王朝“称契丹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③！宋王朝“称契丹为叔父”，这是宋真宗时期大地主阶级屈辱投降政策的产物。一〇〇四年寇准领导的宋军，在抗辽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大地主投降派却迫不及待地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规定每年向辽统治集团交纳大量财物，并规定宋王朝称辽太后为叔母。王安石反对这种可耻的投降路线，他坚决主张反侵略，加强国防。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其主要目的就是企图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贫”和“弱”只是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北宋大地主顽固派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宋仁宗时，辽的威胁未除，西夏之侵扰又来。但大地主腐朽集团为了苟延残喘，在侵略者面前“若小侯之事大国，无敢不从”^④，而对内却肆无忌惮地实行“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⑤。这就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使宋王朝面临着“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⑥的严重局面。

对外政策是和对内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在内政上实行一条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守旧的政治路线，是根本不能坚持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的。王安石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敢于批判儒家思想，从客观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没落。他是著名的革新家。他的变法对内反对大地主兼并土地，对外反对向辽和西夏的反动统治集团投降。他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采取了一系列变法措施，企图在打击大地主兼并势力、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赋税收入，同时改革宋王朝落后的军事制度，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他指出：“偷安与受给，自古有亡国。”^⑦他坚决主张抛弃大地主投降派的“祖宗之法”，希望通过变法“救国家积弱之势，振累世因循苟且之习”^⑧。王安石变法的结果，使宋王朝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显著加强。他所采取的反对大地主兼并的理财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增加了宋王朝的财政收入。据记载，十多年后，同辽对峙的河北“边防大计，仓廩充实”^⑨，“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⑩。军队战斗力有所加



强。“军器监”制造的大批武器，“可足数十年之用”^①。这些材料即使可能有夸大，也反映出大地主阶级顽固派无法完全抹煞变法的积极成果。变法期间，在王安石主持下，宋王朝任用了法家沈括和名将王韶、宗谔负责抗击西夏的武装侵略，率军收复了河湟地区长期失陷的大片领土。

王安石爱国主义的变法路线，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的。王安石总结了历史上法家路线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和经验，对商鞅、吴起、桑弘羊等作了高度的评价，公开要求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他曾经当着宋神宗的面赞扬吴起变法，要求宋神宗认真学习“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②。北宋变法前夕，冗兵总数已从宋初二十万人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万，维持这支军队的费用，占去了全国赋税收入的六分之五。但在对辽和西夏的军事斗争中却屡战屡败，毫无战斗能力。王安石认为，这种雇佣兵制度是“五代乱亡之遗法，其不足以致安强无疑”^③，如果不进行改革，“则中国无富强之理”^④。因此，王安石根据商鞅的“什伍之法”的精神，提出要鼓舞“州民使习兵战”^⑤，以便为逐步用征兵制度代替雇佣兵制度准备条件。王安石实行的这些军事措施，当然也具有加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面，但在当时主要是为了造成一支足以抵抗侵略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使遭受侵略的当地人民能够奋起自卫，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侵略者面前是主张抵抗还是宣扬投降，这是北宋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凡是对内搞分裂、搞复古倒退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搞妥协投降的。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反动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大搞尊孔复古，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人民群众反侵略的正义斗争，甚至不惜卖身求荣，充当民族的败类。王安石变法后不久，辽反动统治集团害怕北宋变法成功后“中国安强，有窥幽燕之计”^⑥，企图趁宋“未强之时，先扰中国”^⑦，派兵进行武装威胁。王安石面对这种侵略战争，坚决主张抵抗，认为：“契丹四分五裂之国，岂能大举以为我害？”^⑧他看穿了契丹贵族集团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本质，认为如果对他们“示弱太甚”^⑨，一味退让、妥协，只会助长他们的侵略野心。他根据宋朝变法后的人力物力，准备出兵恢复被辽长期侵占的幽燕之地。相反，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之徒在辽举兵入侵的事实面前，则采取了投降卖国的政策。有一次，宋神宗问范纯仁能否带兵出征，范纯仁吓黄了脸，急忙说：“臣儒家，未尝学兵法”^⑩。富弼等人一听说宋神宗要亲征，就“心陨胆落”^⑪。韩琦公开主张“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彼疑”^⑫。他们把坚决主张抗敌的王安石看成是眼中钉、



肉中刺，倾巢而出围攻之。他们否定抗敌的必要性，胡说什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②王安石针锋相对地回答：“方其能刚强，必不至柔弱”^③，只有国家强盛，坚持反侵略斗争，才能不受欺凌。

大地主顽固派对王安石的爱国主义路线的攻击，暴露了他们的卖国主义立场。司马光等人历来畏敌如虎，生怕变法图强触怒了辽和西夏侵略集团，轻描淡写地把侵略者武装掠夺说成是“边鄙小事，何足介意”^④！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把宋王朝每年向侵略者奉献“百万之财”，美化成“屈己之愧小，爱民之仁大”^⑤，甚至打肿了脸充胖子，叫嚣：“人主爱民物，心无彼此情。约欢同一国，蒙福徧群生。”^⑥在司马光这批孔孟之徒身上，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呢？他们拿人民的血汗去供养侵略者，换得大地主顽固派的一时苟安，这就叫做“爱民”；而把人民的灾难说成是“蒙福”。他们同侵略者“约欢”，亲热到不分“彼此”，这就叫做“仁”。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编造的这些奇妙的逻辑，不只是活生生地勾画出他们自己的丑恶嘴脸，而且也表明了他们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就是投降有理、爱国有罪的理论根据。

北宋大地主反动集团推行卖国主义的路线，有其深刻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历史原因。王安石变法前夕，一小撮大地主垄断了全国十分之七的土地，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⑦。大地主顽固派把农民起义视为心腹之患，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他们害怕进行反侵略斗争会把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动摇他们的反动统治。因此，他们宁愿向侵略者屈膝投降，而不愿进行反侵略斗争。在他们的眼中，“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⑧。他们认为跪在辽和西夏侵略者面前，还可以保住脑袋；如果被人民推翻，那就一切全完蛋了。因此，大地主顽固派的投降卖国是必然的。

毛主席在批判中国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卖国主义时指出：“**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从历史上儒法两家在投降卖国还是抗战爱国的斗争中，可以更深刻地懂得，只有广大的革命阶级、革命的人民，以及剥削阶级中主张进步、革新的集团和派别，才能够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对侵略者坚持抗战，而坚持倒退、守旧的反动派，总是要投降或想投降的。王明、刘少奇、陈伯达、周扬之流宣传过的“国防文学”，其实是卖国文学。林彪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同他卖国投敌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



们同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

二

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它是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安石变法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然而北宋以后的道学家却妄图把王安石变法说成是北宋灭亡的原因。北宋灭亡前夕，道学家杨时首先出来叫嚣：“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②后来，有人还挖空心思地炮制了话本《拗相公》，说什么“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③。但是，历史事实是抹煞不了的。南宋初年，有人就驳斥道学家杨时说，“荆公之时，国家全盛”，“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④。北宋的灭亡，决不是王安石变法路线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由于司马光的儒家路线推翻和取消了王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路线而造成的。宋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在反对变法的高太后支持下重新登台掌权，他们把卖国主义的理论变成了行动，对于变法的一切措施，他们是罢，罢，罢，一罢到底；对于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他们是让，让，让，一让到底。王安石变法期间，宋王朝抵抗西夏的武装侵略，取得了很大胜利，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时，司马光却唱着“宁为百姓屈己”^⑤的卖国调子，主张抛弃变法期间收复的土地。在司马光的带头下，顽固派发出了一片“弃地”的嚷嚷声，什么“不可不弃”^⑥啊，什么“守之无所得，弃之不足惜”^⑦啊。文彦博甚至奴颜婢膝地说，如果及早自弃，西夏就会“感带（戴）恩德，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⑧！这伙顽固派“弃领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黷武”^⑨，把变法期间收复的一大部分土地、特别是陕北的米脂等四个边防军事要塞拱手送给了西夏的反动政权，结果“四海吞声，虏计得行，边防受害”^⑩，种下了北宋王朝迅速灭亡的祸根。顽固派的屈膝投降行径，适应了辽和西夏反动统治的需要，怪不得司马光重新上台时，在辽的反动统治者中得到了很高的声誉，叫喊“中国相司马矣”^⑪！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动儒家对北宋的灭亡负有直接责任。北宋王朝灭亡前夕，金统治者大兵压境，大地主顽固派却还在热衷于“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⑫，鼓吹尊孔反法，实行反攻倒算。正如当时的民谣所描绘的，“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秋”指金兵在秋天的进犯），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灭宋的金右副元帅斡离不的封号），却管舒王（王安石死后封号）”^⑬。这首民谣，活活刻画出这一小撮顽固派尊儒反法、投降卖国的嘴脸。他



们置亡国之祸于脑后，热衷于尊孔崇儒，镇压抗战派，怎么能不亡国呢？鲁迅说得好：“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孔孟之道是卖国主义的“老调子”。谁唱起了这种“老调子”，谁就是在宣扬卖国主义路线。但是，不管南宋反动的道学家们如何颠倒历史，王安石将作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载入史册，司马光一伙顽固派则永远作为卖国主义者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叛徒、卖国贼林彪学着道学家的腔调，大骂王安石是“拗相公”，充分暴露了他妄图充当苏修的“儿皇帝”，把中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丑恶嘴脸。

从王安石变法这桩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家路线同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家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进步学派，决定了它是同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挑起民族矛盾的都是各族的反动统治阶级。无论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压迫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或者其他民族反动统治者侵扰汉族劳动人民，都是一律应该反对的。王安石坚持革新、反对外来侵略的政治路线，不仅对宋朝人民有好处，对辽和西夏反动统治集团压迫下的人民也有好处。因此，这是一条爱国主义的路线。相反，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动儒生，反对任何变革，坚持复古倒退。尽管王安石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不可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也不可能改变大地主阶级统治的本质，但即使是这样，司马光也仍然不能容忍，把它当作洪水猛兽镇压下去。他们走上卖国主义的道路是奉行孔孟之道的必然结果。尊孔必然卖国，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反动的孔孟之道，是为没落阶级服务的，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对内进行反革命统治、对外实行卖国主义的理论根据。正如鲁迅指出的：“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花边文学·算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我们今天讲的爱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而王安石的爱国主义是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爱国主义，它必然要受到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但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了王



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性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在长期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联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原地区从事农业为主的汉民族同我国北方以游牧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之间，曾出现过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发生过民族冲突和战争。对这种民族战争应该作具体分析，看到有正义与非正义、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区别。当这种民族之间的压迫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时，反对民族压迫，“**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便是爱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历史上这种在反对民族压迫中形成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应当予以继承和发扬。

儒法两家在对待民族压迫与掠夺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所决定的。秦始皇统一中原六国后，同我国北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矛盾就突出起来。秦始皇曾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击败匈奴，收复河套以南地区，设置九原郡，移民垦边。相反，那些反动儒生则叫嚷“亡秦者，胡也”^{④②}，幻想依靠匈奴侵略者推翻秦王朝，实现奴隶制复辟的迷梦。当时，有一批奴隶主贵族为了逃避地主阶级专政，亡命投奔匈奴。直到汉武帝时，他们的子孙还自称“秦人”，帮助匈奴侵略者同汉王朝作对^{④③}。

汉代初期，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拥有几十万骑兵，奴役压迫着当时几十个小邦。据记载，“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④④}。匈奴奴隶主贵族对汉朝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是反对侵略还是屈膝投降，成为汉初儒法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汉朝内部那些大搞分裂割据、破坏国家统一的同姓王和异姓王，都“事穷智困，卒赴匈奴”^{④⑤}。例如，韩王信在阴谋叛乱前，就“与匈奴约共攻汉”^{④⑥}。燕王卢绾在发动叛乱失败后，“将其众亡入匈奴”^{④⑦}。吴楚七国之乱同匈奴侵略势力也同样有密切的联系。吴王濞写给各诸侯王的信中公开宣布，“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庙，愿王勉之”^{④⑧}，暴露了他们阴谋勾引匈奴侵略者推翻封建中央集权的汉王朝的罪恶计划。匈奴奴隶主贵族也跃跃欲试，准备“与赵合谋入边”^{④⑨}。由于这次叛乱被迅速地镇压下去，这一阴谋才没有实现。相反，法家都是主张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入侵的爱国主义者。晁错根据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抗击匈奴的具



体措施。桑弘羊根据同匈奴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经验指出，“事不豫辨(办)，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④，事先不做好反侵略的战备，就对付不了侵略者的突然袭击。他认为秦始皇之所以能够打败匈奴，就是因为按照“商君之遗谋，备饰素循”^⑤的缘故。而反动儒生却公开主张“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⑥，妄图对匈奴奴隶主贵族开门揖盗，自毁长城。大量事实说明，一切搞分裂割据的反动派，总要勾结外来的侵略势力，而一旦他们的阴谋破产，就必然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汉代以后的历史，同样证明了儒家的卖国主义本质。五代十国时，后晋的石敬瑭为了换得“儿皇帝”的地位，甘心情愿“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⑦，把幽云十六州出卖给了契丹侵略者。这个四十五岁的卖国贼，竟然无耻地称三十四岁的“契丹主为‘父皇帝’”^⑧。在宋代，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大地主顽固派，不仅继承了历史上卖国主义者的衣钵，而且发展了儒家的卖国主义理论。南宋的道学家们继承了北宋道学家的卖国主义衣钵，汉奸、卖国贼秦桧就以儒家正统自居，攻击主张反侵略的人是“未纯乎儒术”^⑨，无耻地叫喊“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⑩。道学家朱熹比较狡猾，他偶尔也空喊几声“抗金”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大肆攻击王安石的爱国主义路线，攻击一切真正的抗战派，暴露了他假抵抗真投降的卖国贼面貌。正如陈亮在当时揭露的，朱熹之流道学家“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⑪。近代以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之流，也都披着儒家的袈裟，演出了一幕幕卖国主义的丑剧。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投奔苏修，也决不是偶然的。他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利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尊孔派，必然走上卖国主义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汉族有，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不论是那一个民族所产生的，不论是汉、满、蒙、回、藏、壮、维吾尔或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世代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伟大祖国。而古今中外的反动派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一切进步的改革，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国的统



一和独立，歪曲和污蔑中国历史上进步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因此，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

注

- | | |
|--|---|
| <p>① 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二一：《河北民》</p> <p>② 《欧阳永叔集》卷五：诗《边户》</p> <p>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p> <p>④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八</p> <p>⑤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p> <p>⑥ 《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p> <p>⑦ 《临川先生文集》卷一〇：诗《同昌叔赋雁奴》</p> <p>⑧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p> <p>⑨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七</p> <p>⑩ 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p> <p>⑪ 吕陶：《净德集》卷四：《奏乞罢军器冗作状》</p> <p>⑫ 转引自陈瓘：《四明尊尧集》卷三：《论道门》</p> <p>⑬⑭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p> <p>⑯⑰⑱ 《宋史·兵志·保甲》</p> <p>⑲ 《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二</p> <p>⑳⑲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p> <p>㉑ 《续资治通鉴》卷七〇</p> <p>㉒⑳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三：《北边劄子》</p> <p>㉓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代叔礼作使北诗》</p> <p>㉔ 《欧阳永叔集》奏议集卷四：《再论置兵御</p> | <p>贼劄子》</p> <p>㉕ 《宋史·宋绶传》</p> <p>㉖ 《宋史·杨时传》</p> <p>㉗ 《宋元话本集·拗相公》</p> <p>㉘ 转引自《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四</p> <p>㉙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三：《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劄子》</p> <p>㉚ 《宋史·范纯粹传》</p> <p>㉛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p> <p>㉜ 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卷二六：《论西边事》</p> <p>㉝⑳ 转引自《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一</p> <p>㉞ 《续资治通鉴》卷八〇</p> <p>㉟ 《宋史·钦宗纪》</p> <p>㊱ 李璩：《阅史邻视》卷三</p> <p>㊲ 《史记·秦始皇本纪》</p> <p>㊳ 《汉书·匈奴传》</p> <p>㊴⑳ 《史记·匈奴列传》</p> <p>㊵⑳⑳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p> <p>㊶ 《汉书·荆燕吴传》</p> <p>㊷⑳ 《盐铁论·世务》</p> <p>㊸ 《盐铁论·非鞅》</p> <p>㊹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p> <p>㊺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p> <p>㊻ 叶昌炽：《语石》卷八</p> <p>㊼ 《宋史·秦桧传》</p> <p>㊽ 《宋史·陈亮传》</p> |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燕 枫

怎样从本质上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建立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概括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理，就是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时，深刻地阐明了这一思想：“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几十年来，我国人民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遵照这一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整体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每一个局部上，又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因而能够打败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紧接着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了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使一个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奴仆，他们被阶级敌人的暂时的表面的强大



吓破了胆。在战略上，他们总是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人民的力量，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甚至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双手交给敌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使它不敢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能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在战术上，他们又往往不重视敌人，采取轻率莽撞的态度，致使革命遭受损失。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头子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是这样，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也是这样。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就曾经一再暴露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林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唯心的反动世界观出发，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提出了所谓“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主席针对林彪的错误，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严厉地批判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信中，毛主席全面地考察了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的发展，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指出国内形势处于**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并且形象地描写为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毛主席对于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党内外喧嚣一时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毛主席指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毛主席在全面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并且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路线。林彪却和王明相呼应，顽固地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抗拒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作战方针，不相信全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反动派身上，公然鼓吹阶级投降主义，无耻地吹捧蒋介石。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面目暴露得更加明显。抗



日战争刚刚胜利，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当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一种，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一种，是由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扑灭中国革命，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两种命运决战的关头，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藐视有美帝国主义撑腰的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来对付蒋介石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因此，“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并且告诫全党：“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而林彪却紧紧追随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不敢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叫嚷什么“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当毛主席毅然决定首先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发起辽沈战役的时候，林彪又跳出来竭力反对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毛主席及时地针锋相对地批判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武装起来，很快地夺取了东北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战略思想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无产阶级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是从对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提出来的。毛主席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辩证法，无产阶级的战略战术思想的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的正确反映。



毛主席说：“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表面上弱小但是正在生长中的事物，一定要战胜表面上强大但是已经腐朽的事物。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向前发展的。一切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革命力量，总是要战胜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反动力量。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可见，新兴的地主阶级代替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代替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代替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产阶级肩负着最后埋葬剥削制度的历史使命，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斗争过程中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它必将战胜资产阶级，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切剥削阶级，所以必然要化为反动派，化为纸老虎，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推翻，是因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他们的阶级利益同广大人民的利益处于对立的地位。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观察问题要抓住本质，不要为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从现象上看，反动派有时显得颇为“强大”，样子有点可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革命人民。经过顽强持久的斗争，人民一定会战胜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主席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就是建立在充分相信人民具有伟大的创造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长了人民志气，灭了敌人威风，使革命人民树立起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在战略上、在整体上必须藐视它，决不意味着在战术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在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可以不重视它。这是因为，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对立的统一。不从战术上重视敌人，不善于斗争，即使具有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还是不能获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



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说反动派是真老虎，是因为它们暂时还有力量，手里拿着刀，武装到牙齿，为了维护反动阶级利益而进行垂死挣扎，成百万成千万地吃人。为此，革命人民在同它们作殊死斗争时，必须做到在战术上、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把夺取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如果不是这样，在战术上采取冒险主义、轻举妄动的态度，必然会犯错误，危害革命。同样，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如果我们不是认真对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策略、措施去解决，也就不可能取得斗争的预期成功。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是在军事上把战略上藐视敌人同战术上重视敌人高度统一起来的典范。一方面，毛主席深入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向全党全军明确宣布，蒋介石必须而且一定能够被我们打败。在十大军事原则中，贯串着无产阶级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指出，蒋介石还暂时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为了彻底消灭它，必须采取慎重态度，执行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正确战略方针。在十大军事原则中，也贯串着这种**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的思想。

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出发，总要顽固地对抗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实际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资产阶级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在战略问题上他们总是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林彪就是这样。而这正是导致他一贯右倾动摇，畏敌如虎，最后堕落为叛徒、卖国贼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我们要取得反复辟斗争的彻底胜利，也必须做到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



不了的。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活动不要怕，对国内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不要怕，对党内出修正主义不要怕。它们都是腐朽的势力。它们的破坏和捣乱，是出于反动阶级的本性，不表明它们力量的强大，而是说明它们的虚弱，其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坚信前途是光明的。当然，对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可能出现的曲折和反复，我们要有正确的估计，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要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讲究斗争策略，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其间难免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我们在战略上必须藐视困难，不要在困难面前一叶障目，畏葸不前；在战术上又必须重视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困难。这就是说，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既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当前，世界形势一派大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了提高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毛主席多次阐明了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指出：“**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同时，毛主席又指出，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还要采取正确路线，讲究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反帝力量。只要把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坚持斗争，世界革命人民就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光辉思想，把它作为我们批判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武器，作为我们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根本战略战术思想，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三字经》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剖析《三字经》的两个增补版本

合肥市杏花村公社 方玉荣 李 敬



《三字经》相传是南宋儒生王应麟编纂的。当时，南宋王朝不断受到农民起义的猛烈冲击，又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处在朝不虑夕、风雨飘摇的境地。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一面动之以刀枪，残酷地镇压革命人民；一面“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妄图用虚伪的儒家说教来扼杀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三字经》的出笼，正是适应了南宋统治者这种反动的政治需要。

由于《三字经》通篇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南宋之后，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把它定为“首诵”的“启蒙”读物，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增补和修订，使它更加直接地为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历代反动派增补和修订《三字经》所留下的种种痕迹，暴露了他们的罪恶用心，也清楚地说明了《三字经》这本小册子的反动作用。

根据我们看到的史料，南宋之后孔孟之徒对《三字经》的增补、修订，主要是在叙述历代的历史部分。清代道光年间，在儒生贺兴思注解的《三字经注解备要》中，增补了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记述，共二十四句。增补者把明王朝的灭亡说成是“神器焚”，为它大唱挽歌；相反，却诬蔑明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是“寇如林”，发泄了对农民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在注解中，更明目张胆地攻击李自成是“李贼”，并且捏造说，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之前，给李自成



留下一首“血诗”，要他“不可损黎民”，给地主阶级头子披上一件“爱民”的外衣，无耻地美化腐朽透顶的封建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历史，进入清代，已经到了末世。特别是在所谓“康乾盛世”以后，更是危机四伏。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的斗争浪潮此伏彼起，几乎不曾间断过。新兴的市民阶层与反动没落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发展。《三字经》增补者所处的嘉庆、道光时期，封建统治更是濒于崩溃，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为了支撑自己的反动统治，清王朝只有用虚妄的“天命论”来说明自己反动统治的“合理性”，大肆散布诸如清统治者的祖先“为天女所生”，“以定国乱”之类的谎话。清世宗胤禛就曾一再宣称，清王朝的统治是“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清版《三字经》的增补者，就是按照反动统治者的这种旨意，在《三字经》里增加了“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四句话，极力伪造历史，借以粉饰太平，吹嘘清王朝的所谓“文治”“武功”，妄图要人民群众相信清统治者是“受命于天”的，并且屈从于他们的反动统治。这就是清王朝修订、增补《三字经》的罪恶用心。

一九二五年由上海宏大善书局刊行的《三字经》版本，又修订、增补了清代和所谓“民国”时期的一段历史，计三十二句。其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动性，较清本更为露骨。这个版本一方面把清代雍正、乾隆、嘉庆等封建统治都吹嘘为“民安富，治绩夸”；另一方面却诬蔑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什么“继粤匪，创天理，民遭殃，如汤沸”。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血腥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增补者则别有用心地说成是“开海禁，交互市”；最后，还心怀叵测地加上了“愿同胞，勿操戈”两句。这一番增补，也是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着的。

我们知道，一九二五年，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为标志，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猛烈地冲击着反动统治。地主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之流，混在革命阵营内部，大耍反革命两



面派手法，表面上伪装革命，暗中却和帝国主义勾结，伺机向革命人民发动进攻。《三字经》增补版本中那些咒骂太平天国革命的切齿之声，正是寓藏着蒋介石之流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的极端仇视和万分恐惧。其中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肆意美化，也是为蒋介石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制造舆论的。当时，蒋介石之流为了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还到处散布“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等谬论。所谓“愿同胞，勿操戈”，实际上就是给蒋介石在暗地磨刀霍霍、伺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施放烟幕，妄图把革命人民屠杀于无准备之中。在这个增补版本出笼的前一年，出过一本解释《三字经》的《蒙养释义》，它把《三字经》称作“辅国家政教所不及”的“善书”，并且说什么：“世风浇薄，非善书不能挽回”。这就明确地道出了国民党右派修补《三字经》的政治目的。直到今天，苟延残喘的蒋介石集团还把《三字经》作为加强反动思想统治的工具，大加宣扬、吹捧，恶毒咒骂对《三字经》的革命批判，竭力维护孔孟之道，妄图挽救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可见，一本小小的一千来字的《三字经》，何等敏锐地反映着阶级斗争的风雨，表达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事实充分说明，《三字经》完全是为反动统治阶级而编纂，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的。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于《三字经》的反动作用，也是竭力加以利用的。解放以后，刘少奇一伙为配合其反革命复辟活动，曾经把《三字经》改头换面，重新出版。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直接地按照《三字经》中“我教子，唯一经”的反动说教，公然鼓吹“教子读经”，要他的儿子以“韦编三绝”的精神，去承受孔孟的复辟之经、倒退之道，妄图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林家王朝。然而，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他们在《三字经》上所花费的苦心，只能为自己制造一纸妄想，为革命人民留下一部反面教材。



批“半部《论语》治天下”

卞石中

南宋以来，中国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反动而又荒谬的论调。历代反动派把它当作治国的法宝，大肆吹捧。钻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也把它当作经典，津津乐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的同伙就把“半部《论语》”作为他们“夜话”的一个话题，用来破坏学习马列主义的群众运动。在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影响下，有人还曾把“半部《论语》治天下”抄在袖珍笔记本上，当作座右铭。

历史上果真有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事情吗？

据查，这句话源出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的一条记载：宋朝初年的赵普，当过两朝宰相，却读书不多。当时有人讽刺他“所读者止《论语》”。这话传到了当朝皇帝宋太宗的耳中，宋太宗问赵普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普回答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其实，罗大经也知道赵普的话不符合事实，不得不承认：“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但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为了吹捧《论语》，却把赵普的话说成是“天下之至言”。《鹤林玉露》的记事，是“偶据传闻，不复考核”的，本不足信。可是后世儒生却因缘附会，口笔相传，搞成了一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把孔孟之道吹上了天。

事实上，赵普辅佐赵匡胤兄弟平治天下，靠的并不是什么《论语》。唐代以后，中国在几十年间处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状态。军阀混战，部族相侵，人民惨遭杀戮，生产力受到破坏。渴望统一，渴望平定，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反映了



历史发展的趋势。赵匡胤在这种局面下，取后周而代之，又在赵普协助下，进行了十几年的统一战争。为了巩固统治，赵普吸取过去“节镇太重，主弱臣强”的历史教训，为赵匡胤提出了种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免除了藩镇割据的威胁。所有这些，与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路线和忠孝仁义的说教都是对立的。可见，关于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南宋儒生们借以骗人的谎言。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谬论，所以起于南宋而又附会在赵普身上，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封建地主阶级在宋朝以后，已走向没落。即使比较有作为的赵匡胤和赵普等人，也不敢公开打出反儒的旗帜，而是一面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一面又挂起儒学的招牌来作掩饰。赵匡胤即位后的头一个月，就“命葺修先圣庙，并励武人读书”，赵普就在劝读之列。此后，他又提出“作相须读书人”，并“大重儒者”。可见，儒学到了宋朝，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不敢须臾离开的欺骗工具了。

南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烧。官僚大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特权，迫切要强化反动的思想统治，以便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欺骗、镇压。于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孔孟之道，得到了宋儒的进一步加工、修补，形成了极端反动的思想体系，即程、朱的“理学”或“道学”。这个时候，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特别时髦，《论语》也从“小儿学问”一下子跃升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腐儒们为要抬高《论语》的身价，就把开国元臣、当过两朝宰相、又用苦读《论语》装点过门面的赵普，当作鼓吹“半部《论语》”也可以“治天下”的典型。与罗大经同时代的王应麟，还把“赵中令，读鲁论”编在《三字经》里，欺骗老百姓。后来，元人修《宋史》时，又添油加醋，说赵普晚年苦读《论语》，“手不释卷”，“读之竟日”，以至于“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把孔孟之道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论语》假如真有这么大的妙用，宋朝的统治岂不是可以巩固下去，长治久安了吗？而事实却如鲁迅所说：“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



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宋朝灭亡的事实，对“半部《论语》治天下”实在是一个无情的讽刺。

尽管如此，历代反动派仍然热衷于鼓吹“《论语》治天下”。因为《论语》记录着孔老二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言行，是极端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关头，奴隶主阶级用它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在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地主阶级顽固派又用它来反对革新、镇压农民。

没落奴隶主贵族鼓吹用“儒学”治天下是为了复辟奴隶制。孔老二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所谓的“礼”、“仁”、“德”统统是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维护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武器。在“礼”、“仁”、“德”的掩盖下，奴隶主贵族任意残杀奴隶；又以不“仁”、无“德”为罪名对法家进行疯狂的攻击和残酷的迫害。历史上多少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惨死于儒者之手，多少次人民革命遭到儒家的镇压。这就是儒家以“礼”、“仁”、“德”治天下的真实含义。

地主阶级顽固派鼓吹用《论语》治天下，则是为了反对革命、镇压人民，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明朝的王阳明是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当他举起屠刀向人民砍去时，嘴里还喊着：“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当人民向刽子手们讨还血债时，他又恐吓说：杀了人，“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清朝的杀人魔王曾国藩拚命叫嚣：“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他疯狂屠杀太平天国革命军，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天命”所支配的封建秩序。曾国藩洋洋得意地说：“少读《论语》，至‘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深服其言，书诸座右，日必三复，厥后用兵执政，时时不忘此言。”从曾国藩搞“克己复礼”，“用兵执政”的事实中，可以充分看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反动性。鲁迅说：孔夫子的治国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真是一语道破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阶级实质。

没落奴隶主贵族以“儒学”治天下的结果，是奴隶制的灭亡和封建制的胜



利。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以《论语》治天下的结果，则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封建王朝的灭亡。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代表袁世凯，一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就通令“尊崇孔圣”，发布《祭孔令》，穿起“古怪的祭服”，俨然摆出以《论语》治天下的架势。一番吹吹打打之后，“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但是，《论语》并不能帮他的忙，洪宪皇帝的复辟丑剧只演了短短八十三天，就宣告收场了。

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也妄图用《论语》来阻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蒋介石高喊：“四书五经”，“是为政的基本要道”，“是永久不变的原则”。他靠着这些“要道”和“原则”，在“剿匪就是行仁”的反动口号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可是“围剿”的结果如何呢？其积极的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蒋介石的“行仁”，就是以对人民的疯狂屠杀，换取帝国主义的信任。然而，“半部《论语》”或“四书五经”都不能保住蒋家王朝的天下，中国的大地上终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事实表明，历代反动派愈是临近灭亡，就愈是狂热地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因为他们不甘心失败，还要作垂死挣扎，还要作复辟的迷梦。但是，他们终究逃脱不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历史命运。

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们不断进行批判《论语》、反对孔学的斗争。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把儒家的谬论统统斥之为乱世的“妖言”，把儒生斥之为有害于社会的“蠹虫”。他们认为，“治天下之柄”在于“立法术，设度数”。要想治出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天下，必须靠“法治”。商鞅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不批判儒家路线，法家路线就贯彻不下去。这是法家同儒家斗争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秦始皇能够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天



下，就因为他击败了吕不韦的复辟倒退路线，粉碎了吕、嫪集团的政变阴谋，果断地实行了“焚书坑儒”，保证了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

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转向尊儒反法，由效法秦始皇到攻击秦始皇，表明地主阶级已由革命转向反动。这时候，坚持法家路线的地主阶级革新派人物，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地主阶级的没落，决定了他们变法的必然失败，法家的阶级局限，注定他们开不出解决封建社会根本矛盾的药方。随着地主阶级的日益反动，儒家路线的思想统治日益加强，主张革新、进步的法家，在反对儒家的斗争中，实践革新主张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劳动人民向来是反孔斗争的基本力量。与孔老二同时代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断然宣布：“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是对儒家学说的彻底否定。最早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孔丘的“天命观”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太平天国的革命农民把封建皇帝斥之为“阎罗妖”，把儒家的“经书”宣布为“妖书”，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认识到批判孔孟之道与推翻反动统治的必然联系，提出把孔孟之道的“妖书邪说”“尽行焚除”。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规模空前的批孔斗争浪潮，使曾国藩之流惊呼：“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并说这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连孔丘、孟轲也得“痛哭于九原”。总之，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和否定。革命农民把反孔批儒作为革命的舆论准备和革命的重要内容，并以他们革命造反的实际行动，砸碎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正如毛主席所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动派仍然妄图用孔孟之道来进行复辟活动。林彪一伙多次书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拼命摘抄“四书集句”，恪守着《论语》中“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反革命策略，恶狠狠地写出他的“忍忿法——立大谋。立了大谋，才能忍小忿。九等九忍一狠。”这一切都说明，阶级敌人多么渴望以孔学《论语》来变天！我们同林彪一伙的斗争，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治天



下，还是用孔孟之道治天下的斗争。“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取得的伟大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而林彪一伙，吹捧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妄图用孔孟之道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用孔老二复古倒退的反动路线来改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林彪象历史上一切蠢人那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半部《论语》”不仅没有给他治出一个地、富、反、坏、右的天下，连他自己也变成了齑粉。

纵观革命人民批判《论语》，批判儒家路线的整个历史过程，就可以认清“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尽管古今的反动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都死抱住孔孟之道的亡灵不放，不断变换方式，演出反对人民革命的新场面；而革命者也不断总结经验，掌握和运用革命的思想武器，揭露他们的阴谋，打退他们的进攻。但是在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的批孔斗争不可能彻底。资产阶级也只上阵打了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太平天国的革命家们虽曾豪迈地提出：“且观今世之江山，竟是谁家之天下！……倘得真心实力，众志成城，何难亲见太平景象，而成为千古英雄，复见新天新地新世界也夫！”但终因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以失败告终。今天，我们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彻底批判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成了我们的一项极其严肃、极其艰巨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要团结起来，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深批透孔孟之道，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的鬼话，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支持新生事物 发展大好形势

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

“风庆”轮党支部

编者按：这篇振奋革命精神的文章，很值得一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种精神面貌在“风庆”号船员们身上又一次表现出来。“风庆”号首次远洋试航成功，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凯歌，它长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志气，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风庆”号的革命精神，我们应当加以发扬。

正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前夕，我们“风庆”轮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祖国人民和上海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关怀下，完成了历时一百五十天，往返三万二千哩，运载货物二万二千吨的远航任务，胜利地返回了上海港。



“风庆”号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它出厂后首次航行就跑地中海，途经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穿越七个海峡，先后两次绕过好望角，四次通过赤道，全程等于绕地球赤道一圈半。象这样国产的万吨轮远航欧洲，在我国航运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风庆”轮全体同志，肩负党和阶级的嘱托，行驶这第一次，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不是一次寻常的远航，而是一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斗，是对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能力的一次检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但又充满信心。我们出航的船员虽然只有六十一个人，而“护航”的却是包括广大造船工人在内的亿万祖国人民。万吨轮载着万颗心，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一路上，任凭风浪高，暗礁险，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风庆”号始终英姿飒爽，昂首向前。三万二千哩航行，是不平凡的三万二千哩，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是大长无产阶级志气的三万二千哩。它鼓舞着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给了那一小撮反华小丑一次沉重的打击！它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风庆”轮的胜利远航，为我国造船工业和远洋运输事业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我们国家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起，就有了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制造这种远洋货轮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单单上海就造了二十余艘。为什么国产船直到今天才远航地中海？是因为以前的船质量都不好吗？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造船工人狠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船越造越多，而且越造越好。许多船是完全具备远航条件的。那末，是不是我们的海员不想驾驶自己的国产船去远航呢？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许多老海员尝过帝国主义压迫欺侮的味道，受过外国轮船资本家的气，日夜都盼望迅速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那有一个爱国的船员不愿意驾驶国产的船跨洋过海！国产的万吨轮所以没有及早远航，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种种阻力。有那么一



些人，满脑子崇洋迷外，他们迷信外国的船，而对于国产的船总是百般挑剔，说这也不行，那也不灵。他们散布种种怪论调，说“国产船只能跑近海，不好跑远洋”，说“国产的万匹机不可靠”。有些人甚至作出荒谬的结论：外国机的质量有毛病是偶然的，国产机的质量出毛病是必然的。因此，明明可以航行到世界各个港口的国产万吨轮，却一艘艘被卡住不能去远航。今年年初，人们对于这种状况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终于爆发了一场大争论。这艘万吨轮经过三百个小时的试航，证明主机、船体、导航仪器、水密装置以及舵机的性能都可靠。可是，有些人却偏偏扭住某些问题进行多方刁难，致使交船的日期一再拖延。江南造船厂的工人首先对这个问题贴出大字报，尖锐地指出：不是船有问题，而是某些人的脑子有问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炮轰得好，轰得大快人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广大海员工人和造船工人并肩作战，批判了林彪投降卖国、复辟倒退的罪行和崇洋媚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船的船员同“国产船不能远航”的怪论进行了斗争，贴出了一张题为《我们要革命，“风庆”要远航》的大字报。许多船员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第一条航线也是人开辟出来的，国产船远航我们一定要实现。有些人议论讥笑我们，说我们要驾驶“风庆”号去远航是想出风头，“风庆”号要改名为“风头”号。船员们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们不出个人的风头，我们是为自己的阶级争气！万吨轮、万匹机的制造成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我们争国产船的远航权，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怕前面有千层恶浪，我们驾驶“风庆”轮远航的决心是下定了的。

“风庆”轮的远航，正象广大造船工人和船员说的，是批出来的，是斗出来的。没有批林批孔的革命群众运动，就没有这一次远航。这件事，使我们又一次体会到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重要性。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形形色色的崇洋迷外思想就会抬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得不到很好贯彻；抓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把资产阶级歪风压下去，无产阶级正气得到发扬，革命精神大振，好多本来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也就办到了，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加快前进了。“风庆”轮远航的胜利，正是批林批孔这一场上层建筑领域



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有些人总是瞧不起国产的东西。这次“风庆”轮远航，有人就曾经散布说，“风庆”轮可以远航，不过要把船上的雷达、电罗经等五件国产的仪器设备换成进口的。革命的海员工人和上海产业工人一起，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说换吗？可以！船上还有测向仪、超高频无线电话和尼龙缆绳这三件是进口货，要换上国产的。我们要全部用上自己国产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我们主张排外吗？当然不是。我们并不是一概拒绝外国的东西。船上用一点外国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外国的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都要加以研究，作为借鉴。问题是立足点放在什么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换”，一个要把国产的东西换掉，一个要把国产的东西换上，这不单纯是技术业务问题，而是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感情、世界观，是要不要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对自己国产的东西没有感情，这也不称心，那也不放心，那就连爱国主义也丢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了。一艘万吨级的货轮，好比一个流动工业展览会，反映着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世界上能造万吨轮的国家，一艘船里全部用国产装备的**也不多**。有的只造一只船壳，舵机、主机、辅机、导航设备等，往往是用几个国家的产品装配起来的。我们的“风庆”轮，从机器设备到船员的生活设施，全部是国产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五年的艰苦奋斗，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次“风庆”轮航行三万二千哩，停靠八个国家的港口，每到一处，人们问起我们船的一切，我们总是扬眉吐气地回答：都是中国造的，都是我们国产的东西！当我们向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取得的胜利而喜悦，为祖国的日益富强而自豪！

有的人也许会说，他不是不喜欢国产的东西，而是担心它的质量不可靠。一艘远洋轮，跨重洋，过大海，要经过无数惊涛骇浪，航行设备的质量当然不能忽



视。但是，对质量问题，不同的立场也会有不同的回答。产品不使用，就实现不了使用价值，质量是高是低也无从考核。在使用中提高，在使用中完善，生产的发展过程从来就是如此。不是十全十美就拒绝使用，那就会把一种产品扼杀。产品质量的完善总是有一个过程的。翻开世界造船和船用柴油机的历史，从制造二十五匹马力的船用柴油机到比较稳定可靠的万匹机，资本主义国家就花了整整七十年。难道现在他们的产品就那么十全十美了吗？我们船的一位船长就有过亲身的经历。一九七二年，他先后驾驶过两艘从国外买来的远洋轮，都出过重大事故，分别在海上漂了八个小时之多，而损坏的主机正是所谓信得过的“名牌货”。我们的远洋轮的质量怎样？事实是最好的见证。这一次的三万二千浬航程，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又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珊瑚礁密集的地区，波涛汹涌的海峡，狭窄的港湾，都经历过了。好望角，人们称之为“天无三日晴，海无三日宁，好望不好过”的地方，我们的船两次安全通过。一次风达八级，浪高四米，有条外国船高挂黑球两只，表示已经失去控制能力，而我们“风庆”轮却笑迎狂风黑浪，胜似闲庭信步。整个航程，主机运转了二千三百小时，在南非两岸先后两次连续运转十六天以上，性能很好。一路上，经受了春夏秋冬四季，大风、巨浪、迷雾、暴雨、低气压等各种气候条件的考验。有人不是信不过我们国产的雷达、电罗经、发报机等五大件吗？事实上，正是这些国产的设备，保证了我们的万吨轮安全航行。我们年轻的造船工业和船用设备配套工业，尽管还有这样那样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远洋轮已经具备远航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提高远洋轮的质量，不光是造船工人的事，我们海员工人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经过一次远航，我们积累了一些资料；为建设海上铁路取得了一些经验；不断地远航，就可以不断地积累资料，我们的远洋轮也就可以不断地完善。造船工人和海员共同努力，我们的造船工业和航海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发展。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群众振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象大洋的水，载得起千条万条船，力量大无边。“风庆”轮这次远航，是在批林批孔的革命高潮中开始的。通过批林批孔，提高了海员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激发了大家的革



命责任感。出航前，大家一边搞革命大批判，一边紧张地开展学习掌握新船性能的活动，做到技术上精益求精。船员说：造船工人为祖国造出这样好的争气机、争气船，我们一定要做争气人，开好争气船。全程三万二千哩，无论到那个港口，我们的船外面漂漂亮亮，里面清清爽爽，外国朋友称赞我们，海外侨胞夸奖我们，都说我们的船不仅质量好，而且保养得也好。有的外国人到机舱参观，看到那么整洁，惊讶地说：“啊，这里简直可以供我们跳舞。”若问我们船员的责任感究竟怎样，只要举一举货物保养这件事就够了。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运往罗马尼亚的是一万一千吨大米。大米，是货物中比较“娇”的东西。放在货舱里两个月，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变化。两次经过赤道，大舱气温高达四十度。海上遇大风，巨浪淹没甲板，冲刷着整个舱盖。为了使大米不受损失，大副带领护粮小组的船员，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闷热的夏日，始终每天三五次地检查货舱，使舱温、米温和空气的湿度保持适当。从上海到康斯坦萨港的近两个月时间，米温始终没有超过三十度。到了罗马尼亚，一万一千吨大米，无霉无蛀，完好无损，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好评。从上海到罗马尼亚，又从罗马尼亚回上海，历时一百五十天，举船上下，团结战斗。全体船员一路上写诗写文，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风庆”轮远航三万二千哩，扬眉吐气地回来了。有的同志说，这次是光荣地开出去，胜利地开回来。我们说，正是这样。不过，还得加上几个字：是斗争中光荣地开出去，斗争中胜利地开回来，斗争并没有结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既然是长期的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反对崇洋迷外，也是长期的斗争任务。崇洋迷外的思想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留下来的破烂货，只要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思想总会一再冒出来。彻底地扫除这些垃圾是需要时间的，不能指望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就完全解决问题。

不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风庆”轮远航的前前后后，种种扣人心弦的事迹，使我们



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这艘船和船上的设备是经过上海和全国五百多个协作单位造出来的。这些单位的工人用的是怎样的精神呢？造船体和主机的是江南造船厂。他们造的第一台主机，是在船体车间旁边的一个空地上，搭起芦席棚安装的。为了保证主机的质量，下雨时，工人用自己的衣服盖在机器上，免受损坏；天热时，工人整天在机器旁观察阳光直射带来的影响。他们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汗水浇出高质量的争气机。船上的尼龙缆绳是一家二百五十人的弄堂小厂——红卫绳带厂造的。厂房低矮，场地狭小，工人们挖地六尺，装起自己设计的机器，造出高质量的争气绳。在我们准备远航的期间，也不知道有多少协作厂的工人上船来，帮助我们熟悉各种新设备的性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备品备件，千叮咛万嘱咐，祝我们远航胜利。所有这一切，说明我们中国的工人有着坚定的信念，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海外，我们遇到过不少侨胞，他们以热切的目光望着我们的“风庆”轮，有的把上一次甲板比作踏上一次自己的国土而感到高兴。毛里求斯有一位老华侨，有子女九人，“风庆”轮一靠岸，就扶老携幼上船来参观。老人从船头到船尾，从驾驶台到机舱，细细看，轻轻摸，看到样样是国产品，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华侨的报纸以最醒目的标题发表文章和消息，介绍这艘国产的万吨轮。我们离港时，侨胞们赶来不断地招手，含着热泪高声地喊着：“祖国的船，不断地来啊！”这种动人的场面说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不仅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是海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的共同愿望。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都热烈地希望我们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取得更大成就，以更好地完成我们担负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

“风庆”轮的第一次远航结束了。但是，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我们要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长风，破万里浪，不断奔向胜利的前方！



关键在于端正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

——四川汽车制造厂的调查报告

四川汽车制造厂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设起来的新厂。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这个厂曾经处于后进状态。今年以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个厂的党委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带领广大职工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增强了革命团结，很快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全厂职工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提前三个月超额完成了今年国家规定的汽车生产计划。

为什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工厂的面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厂的党委深深体会到，关键在于要抓好批林批孔，不断端正领导思想和政治路线。

厂党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提高的。原来，厂党委对本厂存在的问题缺乏正确的分析。职工不团结，生产上不去，原因在那里？党委内部各有各的看法。有的怨上级不支持，有的怨工人不听话，就是没有到工人群众中去认真听取批评意见，并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分析问题。由于没有抓住路线这个纲，企业的落后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

批林批孔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深深触动了厂党委“一班人”的思想。在上级领导的帮助和全厂职工的促进下，党委首先在领导成员中间反复组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论述，紧密联系本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和在自己思想上的反映，开展对林彪、孔老二的革命大批判。通过初步学习和批判，他们进一步看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同时也认识到，要改变企业的落后面貌，根本问题在路线，而执行什么路线的关键又在领导。在尖锐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党委成员的路线觉悟如何，执行什么路线，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面貌。在此基础上，他们又遵循毛主席关于“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的教导，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找出党委领导成员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清本厂争论较大的一些



问题的路线是非，促进大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有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真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原来在党委领导成员中，有的同志过去在执行路线、政策上犯过错误，但是有错不认错，硬是顶着；有的同志纠缠历史旧帐，计较个人恩怨，不能团结反对过自己的干部和群众；有的同志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群众的批判，在思想深处不认帐，不服气；有的陷入资产阶级派性，等等，这些错误倾向不仅影响领导班子的团结，而且直接影响到群众之间的团结。批林批孔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自觉性。本着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他们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出发，勇敢地揭露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倾向，自觉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清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用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大局和无产阶级革命大团结的原则，斗不利于职工队伍团结的思想言行；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清除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党委主要成员主动到群众中作自我批评，取得了广大职工的谅解和欢迎。工人同志们说：“对于认真改正错误，积极领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干部，我们就是要支持。”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但端正了党委领导思想和政治路线，增强了党委“一班人”的团结，而且为广大职工的团结树立了榜样。

厂党委通过端正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进一步认识到，要把全厂职工团结起来，根本问题在于抓好批林批孔。他们向全厂职工认真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积极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批，带头联，带头作自我批评，同群众一起战斗，推动批林批孔运动从一个车间迅速发展在全厂，又由车间深入到班组。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因势利导，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了四次批林批孔的战役，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狠批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狠批孔孟之道。革命大批判，激发了广大职工对党、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无比仇恨。大家认识到，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破坏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总祸根，我们工人有千条万条理由搞团结，没有任何一点理由搞分裂。如果我们搞资产阶级派性，闹不团结，那就正中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诡计。革命大批判，使广大职工在工厂争论的主要问题，分清了敌我，分清了路线是非，从而大大增强了革命团结。

要搞好全厂职工的革命团结，必须在各级党组织的周围组织起一支坚强的骨



干队伍。今年以来，厂党委以批林批孔、分清路线是非、增强革命团结为中心，先后举办了四期学习班，把党委、革委会的成员，中层干部，班组长，群众代表基本轮训了一遍。随着革命、生产的发展，他们又不断以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积极分子来充实这支骨干队伍。象滚雪球那样，骨干队伍越来越大，由开初的一百多人，逐步发展到占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批骨干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大大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他们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带头批林批孔，带头斗私批修，带头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带头做好团结工作，带头抓革命、促生产，成为搞好革命团结，发展工厂大好形势的重要力量。

要搞好革命团结，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动员大家都来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同时要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厂党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的教导，依靠骨干，先后在全厂掀起了四次批分裂，促团结，开展群众性谈心活动的热潮。党委主要成员带头走家串户，同干部群众促膝谈心，作自我批评，纠正偏差，承担责任。他们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启发和教育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对待同自己有意见分歧的同志，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正确对待自己，把仇恨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广大职工本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精神，互相走访，有些车间的同志几乎走访了所有家庭。铸钢车间有两个同志，过去是“一对崩”。通过批林批孔，两个人手拉着手，交心谈心，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说：“过去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把你当敌人看待，伤害了同志。”一个说：“过去我把被错整的帐记在你身上。现在清楚了，分裂我们的是林彪。我们都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林彪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现在，他们俩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成了“一对亲”。经过这样几次群众性的谈心活动，影响群众之间团结的各种“疙瘩”解开了。全厂出现了群众性的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共同批林批孔的新局面。

搞好革命团结的过程，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的。正当这个厂的干部、群众，通过抓批林批孔，抓路线，使革命团结不断增强的时候，有人吹起了一股“冷风”，说什么这个厂的党委强调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火药味不浓”，“划框框，定调调”；说什么促进革命团结是搞“中庸之道”。是听任这些错误思想泛滥，还是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原则，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呢？这对厂党委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时，厂党委重温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教导和指示，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来分析观察问题。他们连续几次召开了有各级领导和骨干参加的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大家在讨论中，联系过去的经验教训，分析批判了所谓“火药味不浓”，“划框框，定调调”等论调，认为它是缺乏阶级分析和背离批林批孔大方向的。究竟对谁该用“火药味”呢？林彪、孔老二是我们的敌人，对他们的批判就是要有“火药味”，越浓越好。对我们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敌人，还是同志，这个框框我们就是要划，这个调调我们就是要定。不然就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损害我们的团结。至于有些过去曾存在对立情绪的同志，经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同“中庸之道”更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这个厂的党委及时组织干部、群众排除了妨害革命团结的各种干扰，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赞扬和支持。事实证明，坚决地抵制和批评各种错误思想，是保证批林批孔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需要。这样做，从根本上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 and 社会主义积极性；对那些有错误观点的人也是一个教育。

批林批孔是搞好革命团结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革命团结的进一步增强，广大职工革命精神振奋，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广大工人群众表示：“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大于社会主义。一定要把被修正主义路线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怎样把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呢？厂党委重新学习了“鞍钢宪法”，学习大庆的经验，进一步明确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今年以来，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连续组织了三次生产战役，每次都有具体的奋斗目标和战斗口号。全厂职工总动员，上班坚守生产岗位，努力突破生产关键；业余时间开批判会，写批判稿，批林批孔，走访谈心，促进革命团结。领导干部和科室人员也分别到生产第一线，和工人群众一起批林批孔，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在批林批孔的带动下，生产步步上升，造成了革命和生产持续高涨的生动局面，各个车间都涌现出一批坚持革命团结，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无产阶级的正气大大发扬，广大职工中以先进为荣、争当先进的好风气越来越浓，革命和生产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四川汽车制造厂的实践又一次说明：一些所谓“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并不是那么难解决的。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搞好批林批孔，搞好革命团结，群众就会积极行动起来，克服一切困难，改变企业落后面貌，为国家多作贡献。

中共四川省委调查组



两种经济制度的鲜明对照

夏力之

当前，生产萎缩、通货膨胀、失业大量增加的经济危机，正在猛烈地冲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日子都很不好过。这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际形势的一种表现。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危机重重而无法摆脱的衰败景象截然相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下，早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通货膨胀，财政金融日益巩固，人民币的币值长期保持稳定，是世界上少有的稳定的货币。在货币制度上反映出来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鲜明对照，生动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一个国家的币值稳定不稳定，主要的标志，是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保持长期稳定。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币的购买力，长期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发生过什么波动。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棉布、食盐、煤炭等，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一直保持稳定。有一些日用工业品的价格，还在稳定中逐步有所下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目前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但由于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我们人民币的币值长期稳定，人民的生活是安定的，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的。城乡人民的储蓄存款稳步增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反映。同时，币值的稳定，也有利于实行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扩大城乡联系，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我国人民币对外国货币的汇价水平，长期以来也始终保持了稳定，人民币既没有贬值，也没有升值。它在国际上享有越来越高的信誉。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中，已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这对于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对外经济往来，以及排除资本主义金融货币危机的干



扰，起了重要作用。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物价上涨，币值下跌，通货膨胀，金融货币危机接连爆发。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多年来，通货膨胀持续发展，货币购买力不断下跌，市场物价节节上涨。特别是最近几年，境况更加恶化。今年上半年，美国消费物价指数比一九六七年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在金融货币危机的猛烈冲击下，美国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三年先后两次被迫宣布货币贬值，美元威信急剧下降。最近，国际自由市场用美元购买黄金的价格，比官定价格高出三倍。所谓的“金元帝国”早已宣告破产。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金融货币状况也很不妙，国内市场供应紧张，黑市猖獗，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不断下跌。据统计，苏修六十九种主要消费品国营商业的零售价格，一九七〇年比一九六三年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左右。自由市场的价格，比国营商业的零售价格还高得多，有的甚至高出一倍到几倍。苏联卢布的对外币值，在一九六一年兑换新卢布时贬低了百分之五十五。卢布早已越来越不值钱了。

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金融货币危机，是它们政治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的反映，也是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对外扩张，转嫁危机，推行掠夺、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美帝国主义为了缓和与摆脱经济危机，长期以来，对内扩大政府开支，增加军费预算，盲目刺激生产，制造虚假繁荣；对外增加国外军事开支，大搞资本输出，争夺原料市场。其结果，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国际收支连年发生逆差。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三年二十多年中，有十八年发生财政赤字，累计赤字数额达一千五百多亿美元；有二十一年发生国际收支逆差，累计逆差数额达八百八十多亿美元。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便增加税收，发行公债，滥发货币，造成债台高筑，物价飞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日益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它大搞资本主义经营，追求高额利润，盲目进行生产，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它疯狂扩军备战，大量增加军费开支。据各方面的材料计算，目前苏修的实际军事费用，每年已达六、七百亿美元。其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美国。它野心很大，力量不足，对内赖债，对外乞讨。到一九七一年，苏修所欠的国内公债已达到二百八十四亿卢布，并把已到期的经济公债二百五十八亿卢布，推迟到一九七四年以后，分二十年偿还。苏修所欠的外



债，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四年四月，累计已达八十五亿美元。这个自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已堕落到伸手乞讨过日子的窘境。

美苏两霸为了转嫁危机，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竭力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和原料的价格，剥削和掠夺发展中的国家。它们大做军火买卖，牟取暴利，成了世界军火商。它们还在国际金融货币方面推行霸权主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在自己所谓的“大家庭”中，强行使用“汇兑卢布”，把本国卢布变成“国际货币”，妄图控制“大家庭”成员国的经济；另一个则大量输出美元，抵付国际收支逆差，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货币危机。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些行径，已经激起了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国际剥削和掠夺的斗争，也激起了其他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就反过来加深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危机。两个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行为一样，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预见到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说：“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我们分析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手里，他们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盲目发展生产，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被竭力限制在最低限度范围内，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同时，由于战后亚非拉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的国际市场。生产的发展同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国家已发展得越来越突出，使它们不可避免地陷入频繁的经济危机和金融货币危机之中。结果是国内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失业人数增加，罢工运动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在国外，它们的掠夺、侵略政策不断遭到破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原料和市场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并且受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经济危机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的矛



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之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则不存在经济危机和金融货币危机。在我国，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就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指导方针。所有这些，就为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金融货币方面，我们早就铲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的毒害，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统一的、稳定的社会主义货币制度。二十多年来，我国的人民币经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经受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考验，经受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不断扰乱破坏的考验。在多次风浪面前，人民币都能够顶得住，始终保持稳定，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货币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我国人民币所以能够长期稳定，主要靠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商品，并且按照稳定的价格投入市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特征。我们知道，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流通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物资雄厚了，国家手中掌握的商品充裕了，并且坚持按照稳定的价格供应市场，就能够保持币值的稳定。建国以来，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供应市场的吃、穿、用等各类商品大大增加。一九七三年全国商品收购总额和零售总额，比解放初期增加六倍以上。国家掌握的商品库存不断增加，今年六月底，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比一九六五年同期增加将近一倍。现在，我国每发行一元货币，都有几元的商品作保证。这就使得流通中的货币同商品的供应量能够相适应，从而保证了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

做好社会主义制度下稳固的、收支平衡的国家预算，也是人民币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早在建国初期就指出，要“**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



的稳定”。财政收支能不能平衡，直接关系到货币的发行与币值的稳定。“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方针，不允许用增发货币的办法来增加财政开支。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一般总是收入超过支出，略有结余，国家的后备力量不断充实。在遇有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是靠增产节约和国家的后备力量，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以丰补歉，保证收支平衡，而绝不靠借债，更不靠增发货币来解决。现在，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我国财政的巩固和平衡，使得货币的发行能够控制在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扩大的需要范围之内，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的状况。

人民币的长期稳定，还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对货币的发行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并对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有计划地进行调节。人民币是我国唯一流通的货币，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和集中管理。银行投放出去的货币，主要是靠有计划地供应商品来组织回笼。国家每年支付多少工资，采购多少农副产品，需要投放多少货币，相应地要供应多少商品，都由国家有计划地进行安排。这就使货币能够按照计划的渠道发出去、收回来，保证货币的正常流通。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如果遇到某些事先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局部的暂时的不平衡，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计划进行调节，以求达到新的平衡。这是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民币保持长期稳定，归根到底，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成果。刘少奇、林彪一伙曾经鼓吹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反动主张，妄图抓住金融货币这个联结整个国民经济的纽带，打开一个缺口，破坏社会主义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他们的这种破坏活动，及时受到了抵制，没有能够得逞。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现在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包括金融货币制度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日益巩固，前景无限美好。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演冬子,学冬子,做党的好孩子

祝 新 运

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后,大家都很关心我,也都很想知道我是怎样演小冬子的。其实,我还很不懂事,只是在解放军叔叔、阿姨的帮助下,一边向冬子学习,一边演冬子的。

去年进八一厂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一听说要我演小冬子,还是主角,我真害怕,不知道该怎么演。一次,领导上把我们几个找到一块,对我们说:“这次找你们来拍电影,是党交给你们的战斗任务,你们都要象小冬子那样,听党的话,努力把任务完成好。”接着给我们讲了小冬子的故事,又找了连环画《闪闪的红星》给我们看。慢慢儿地,我知道了冬子是个了不起的小英雄,我想,如果能把冬子演好,让许多小朋友都来学冬子,象冬子一样,做党的好孩子,这有多好哇!

我特别喜爱小冬子,一心想把他演好。但是一演起来,可不容易。冬子生在旧社会,是农村的孩子,他会砍柴、爬树,还要给米店老板劈柴、干活儿;我生在新社会,长在北京城,又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什么活儿都不会干。怎么办?向冬子学!冬子是儿童团员,我是红小兵,我们都是党的孩子,他能干的,我一定要学着干。

我的第一课是学劈柴。导演告诉我:“砍刀是冬子跟敌人作斗争的武器,你一定要会劈,还要劈得有劲儿。”我照着叔叔、阿姨教的样子,对着树墩,使劲地劈。劈了十几分钟,我的手臂又麻又疼,叔叔阿姨都让我歇会儿。我想,冬子是不怕苦的,他跟红军叔叔在山上,连吃盐都很困难,吴大叔问他苦不苦,他说:“苦,可我不怕!”我学冬子,也不能怕苦!就这样,我每天在太阳底下(因为我太白,可以晒黑一些),坚持劈呀,练呀,终于学会了。

为了学习砍柴、挑柴,叔叔伯伯经常带着我们下乡,向农村的小朋友学。农村小朋友每人能挑两大捆,可我挑两小捆都很费劲。一根扁担压在肩上,前后晃荡,两只手使劲抓都抓不住。挑一趟,肩膀上就压一道血印。但是,一想到冬子不怕苦,我也什么都不怕了。在学爬树、上竹排和到很远的地方去拍外景的时候,我也是不断地鼓励自己:要象冬子一样不怕苦!

电影就要开拍了,又碰到一件难事——我太胖了。小冬子是旧社会穷人的孩



子，吃得不好，又干那么多活儿；我生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长得很胖，不象冬子的样子。摄影叔叔说：“演冬子，就一定要瘦一点。”怎么才能瘦呢？听大人们说，不吃肉就可以瘦。但是我特别爱吃肉，不吃吧，有点难受；吃吧，就瘦不了啦。怎么办？还是向冬子学！冬子原先不是想跟着吴大叔去打游击吗？可他能听党的话，跟宋大爹一块下山给游击队弄盐，后来又去米店当“学徒”。他说：“我是党的孩子”，“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是党的孩子，也要象冬子那样听党的话，拍电影需要我瘦，我就一定要瘦下去！从那以后，在拍电影的半年中，我就一直没吃过肉。

学习冬子的动作、样子是难，但要学习他的感情就更难啦！因为我没受过冬子那样的苦，开始演的时候，总是没有感情。比如第一场，演到冬子第一次见到红军叔叔的时候，我只会笑，因为我喜爱解放军叔叔，平时一见到他们就高兴，就想笑。还有“妈妈牺牲”那一场戏，导演和辅导员阿姨启发我哭，可是我对着摄影机怎么也哭不起来。下来后，摄制组的叔叔阿姨都说我的感情没有进到戏中去。后来，他们给我讲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启发我理解小冬子的感情。好长时间以后，我才懂得了冬子的心情：如果不是红军来到柳溪，小冬子就会被胡汉三活活打死；所以，当红军吴大叔砍断吊绑“我”的绳子后，我滚着热泪扑到吴大叔的怀里，再也不是笑了。同样，在“妈妈牺牲”那一场戏中，我知道了如果不是妈妈掩护群众，好多群众会被胡汉三和白狗子打死打伤，妈妈是党的人，是好妈妈，但是她被胡汉三烧死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了，怎么能不使“我”心里难受呢！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有多少个这样的好妈妈英勇牺牲了，想到这里，我好象有许多许多的话要说，当说出“妈妈是党的人，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时候，我眼睛里不知不觉就冒出泪水，也射出仇恨的火花。

每拍一个镜头，我就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拍完电影之后，我更加懂得应该爱谁、恨谁，明白了是谁给了我们幸福，应该跟谁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柳溪人民解放了，冬子一家翻了身。柳溪是这样，全国也是这样。在今天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红小兵要跟全国人民一样，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决不让胡汉三这些坏蛋再跑出来搞反革命复辟。

演冬子，学冬子，演完了冬子还要学冬子。电影上映以后，很多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给我写来了祝贺信。我是一个普通的红小兵，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就受到了党和人民这样的关怀和保护。我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走冬子的道路，做党的好孩子。



搞好技术革新 走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

发展工业一定要开展技术革新

宫效闻

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深刻地批判了那种认为我们永远只能在西方科学技术后面爬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贾桂思想，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工人阶级、科学技术人员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发展。

开展技术革新，是充分挖掘现有企业内部潜力、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的可靠途径，也是坚持走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有效途径。在生产技术领域，坚持革命，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重视不重视技术革新，对落后的生产技术要不要变革，这是区别是否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在生产技术领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具体表现。当前，广大工人群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革命干劲高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技术革新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踏步地推向前进，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有些同志一讲到要增加生产，往往就向上伸手，要厂房，要设备，要人。他们认为：“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要使产值加倍，就要厂房加倍，劳动力加倍，设备加倍。似乎没有后面几个“加倍”，生产就不能“加倍”。这是妨碍群众大搞技术革新的一种思想障碍。当然，发展生产，增添一些必要的设备、厂房、劳动力，不能都说是必要的。但是，有些工厂目前的生产水平，对比同行业的先进单位，还有不小的差距。只要把这些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就可以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甚至不花钱，也能办事。何况，不论现在或将来，国家的建设资金总是有限的，工业劳动力不可能也不允许脱离农业这个基础无限制地增加，如果一有困难，就只想到向上伸手，“等、靠、要”，其结果，必然会使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制，“越等心越散，越靠人越懒，越要志越短”。受这种思想支配的单位和部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便成为一句空话。

资金、设备等等“加”上去以后，是不是生产就一定能够那样增加上去呢？也不尽然。许多单位的经验告诉我们，路线不端正，缺乏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广大群众的手脚被束缚住了，钱再多，设备再多，生产也不一定上去；路线对头了，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技术革新广泛开展起来了，即使不增加或少增加劳动力和设备，生产也会迅速发展。文化大革命前，上海钢铁工业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多年徘徊不前。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还是那么几个厂子，人员也基本上没有增加，由于路线对头了，依靠群众，自己动手，大搞技术革新，转炉采用吹氧新工艺，使炼钢能力比原设计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五，五十吨的老平炉改造后产量扩大一倍，五吨的小电炉，装入量不断增加，达到十五吨，全市一九七三年的钢产量，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这就说明，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发展生产的道路是无限广阔的。认为“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不增加设备、厂房、劳动力，生产就搞不上去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这也说明，要在生产技术领域内坚持变革，使生产迅速向前发展，首先还是要解决思想和路线问题。只有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来



解决思想上政治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才能够更好地解决生产技术领域里革新和守旧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单位技术革新开展不起来呢？有的同志说：“我们这里群众干劲大，任务增加一点照样能完成，不搞技术革新也过得去。”还有的同志说：“生产任务这样忙，哪来的功夫搞革新。”这是开展技术革新的又一种思想障碍。群众干劲大，任务加重一点也能够完成，这是好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生产任务会越来越重，如果不搞技术革新，只靠群众拚体力去完成生产任务，是不能持久的，现在“过得去”，将来也过不去。群众干劲大，这是开展技术革新的根本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把生产任务完成得更好。至于生产任务重，是不是就不能搞革新呢？也不是。压力可以变动力。许多重大的技术革新恰恰是在生产任务很重的时候“逼”出来的。许多生产任务比较重的单位的工人提出：“三人任务两人顶，抽出一人搞革新”，不仅使技术革新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生产，而且使生产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可见，生产任务重，不是不能搞革新，恰恰相反，更需要大搞技术革新，使生产和技术革新相互促进。技术革新是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下去。那种强调困难、得过且过的说法，实际上都是消极保守、因循守旧的思想在作怪。

毛主席说：“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安于现状还是坚持变革，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其他一切革命斗争一样，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比之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了飞跃的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不断变革生产条件的结果。一句话，是靠斗争取得的。没有变革就没有发展。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随着生产的发展，新的矛盾还会出现，又需要我们去解决，守旧总是守不住的。修正主义者则认为，发展工业和科学技术只能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他们脑子里只有西



方资产阶级，没有东方无产阶级。他们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压制工业战线和科学技术战线的新生事物，他们固步自封，反对变革，实际上意味着停滞、倒退和复辟。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也是长期的。

历史上代表新兴阶级的法家，主张前进，要求变革，打出“不法古，不修今”的旗帜，向着腐朽、落后的旧的生产关系猛烈冲击，在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的基础上，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儒家鼓吹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说教，则是禁锢劳动人民变革生产条件的精神枷锁。林彪效法孔老二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纲领，宣扬“天命论”、“顶峰论”，也是适应了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复辟、倒退的需要。因此，在生产技术领域，前进还是倒退，变革还是守旧，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的尖锐斗争。无产阶级就是要革旧世界、旧事物的命，在思想上政治上，要同代表剥削阶级的反动势力及其影响作斗争；在生产技术上，也要同一切得过且过、因循守旧的思想斗，同胸无大志的懦夫懒汉思想斗，勇于变革，敢于创新。上海标准件行业，小厂多，设备差，任务重，过去有人认为没有条件搞技术革新。但是工人们说：“不怕难，只怕懒，不怕条件差，只怕没志气”。他们冲破保守思想，大干大变，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几次改革，没有用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全行业已经有百分之九十的机床实现了半自动化、自动化，并且创造了一批自动化联合机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现在，全行业职工人数减少了百分之十八，产值增加了一倍多。可见，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变革，也不在于有没有困难，只要人们的思想从传统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可以打开技术革新的新天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还有些同志认为：“要搞技术革新，就要搞得象个样。”这些同志所说的“象样”，不过是贪大求洋的代名词。在这些同志看来，只有照搬那些上了“洋书”，或者洋人已经做过的东西，才算“象样”，而对广大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土生土长的革新创造，却一概看不起，说它们“不象样”，这也“不正规”，那也“靠不住”。如果技术革新要象他们那个“样”，就只能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只会扼杀群众的革新创造，给群众头上泼冷水。要使技术革新广泛开展起来，必须克服这种盲目



崇洋、妄自菲薄、轻视群众的思想。

广大群众从简易入手，土法上马的革新创造，是不是“不正规”、“靠不住”呢？完全不是。群众的这些革新创造，是他们根据发展生产的实际需要，总结自己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因地制宜地创造出来的，不仅具有花钱少、上马快、收效大的优点，而且用起来得心应手，容易在生产上使用推广，在群众中生根开花。它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产物。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群众简易上马的革新创造，经过不断提高，从点滴的改进发展到整个工艺的改变，从某个机件的改革发展到整个设备的更新，从一种工序的机械化、自动化发展到形成自动生产流水线，以至促使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生产技术面貌的根本改观，其中不少项目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它们不是照搬照抄，产品样式和技术方法都是中国式的，这样就能开拓出一条适合我国条件的多快好省的科学技术发展道路。采取简易办法，土法上马，不但不会排斥洋法，还可以使洋法与土法紧密结合，“吸收那些用得着的東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使洋为中用，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羊毛衫行业，在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为了追求“象样”，靠少数人关门搞自动化，搞了几年，一直搞不出来。去年，有个羊毛衫厂的两个青年电工，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简易上马，仅花了七十二元，创造了一种“光电控制箱”，使四种操作实现了自动化。由于花钱少，收效快，工人十分欢迎，半年时间，就在全行业一千五百台织机上迅速推广，使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十五以上。今年以来，这种简易程序控制又在全市轧钢、锻压、金属切削、橡胶等二十个行业逐步推广使用。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群众简易上马的革新创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简易办法的威风显现出来了，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途径也就越走越宽广。工人说得好：“简易简易，要坚定不移。”因为这是符合技术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的。简易是同复杂相比较而存在的。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这对矛盾永远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要搞简易上马，就是将来生产技术条件更好了，我们还是要简易上马，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不



过那时的“简易”，比现在的“简易”更高一级罢了。

当然，开展技术革新，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讲究实效，注意将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技术革新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往往要牵涉到生产和科学研究的许多方面，不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搞不好的。许多技术革新开展得好的单位的经验证明：在技术革新过程中，既要充分发动群众，注意总结群众的先进经验，又要注重调查研究和反复进行科学试验。这样，就可以少走弯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收到比较大的效果。

“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工业部门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正在向前发展，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大干大变。经济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积极带领群众前进，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组织起来，主动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善于利用上层建筑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技术革新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毛主席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凡是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们，一切坚持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而坚决反对刘少奇、林彪卖国主义路线的革命者，都是热烈拥护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现有工业基础已不断得到增强，开展技术革新的条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优越得多，只要我们按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要求，树立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扎扎实实地做出艰苦的努力，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一切工业部门要订出自己的长远规划，明确今后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并从当前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加强生产上的薄弱环节，想长远，抓当前，争取做到在生产技术上一年有一个小变化，积几年又有一个大的变化，不断变革，不断前进。同时，要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创造的新事物，大力发扬先进，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认真做好技术革新项目的巩固提高工作，使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沿着正确的方向一浪高一浪地发展，争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



技术革新必须依靠工人群众

北京第一机床厂党委会

我厂是一个生产铣床的老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产量一直在一千台左右徘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发挥，全厂团结战斗，朝气蓬勃。革命的大好形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九六九年，第一次突破设计水平。一九七〇年，产量翻了一番。去年，和文化大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比，产量提高了三点二倍，其中大型机床产量增长八倍；产值提高三点九倍；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二点二倍。

我们厂的生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几年以来，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贯彻“鞍钢宪法”，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认真抓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促进了生产的持续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在生产斗争和技术革新运动中，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大搞群众运动；还是靠几个人冷冷清清地干，甚至搞“专家治厂”，这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重要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工人搞一项革新，要经过二十几道手续，就连在机器上打个眼，也得经总机械师批准，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坚持开展革命大批判，破“专家治厂”，立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的思想；破“洋奴哲学”，立自力更生的方针；破“贪大求洋”，立“土洋结合”的方法，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焕发了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广大群众敢想、敢说、敢干，主动找生产中的矛盾，研究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千方百计地在挖掘企业潜力上动脑子，促进了技术



革新的蓬勃发展。从一九六九年到今年九月，共实现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项目三千六百项，其中自制设备四百八十二台，使热加工的机械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冷加工广泛采用以铣代刨等新技术，并出现了一些机械化、自动化的单机和流水线，为挖掘企业潜力，持续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在技术革新中，不单各生产部门广泛开展了群众运动，成倍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就连辅助部门的清扫工、汽车司机也都参加战斗。进厂不到半年的学员，制成粉末冶金自动称料器，基建工人制成预应力空心楼板，备料工人制成砸铁流水线，维修工人制成三十六米跨度的吊车，炊事员制成切肉机、切菜机，等等。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呈现出百花盛开的局面。

开展技术革新，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好革新和生产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生产任务重、时间紧，革新没法搞；另一种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越忙越要搞革新。我们坚持了后一种态度，不赞成前一种态度。因为前一种态度，见物不见人，没有真正认识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实，任务越忙，越能看清生产上存在的问题，技术革新就越有搞头。群众最聪明，最有实践经验，那里最需要革新，怎样革新，革新成果怎样发展，他们最了解、最清楚。群众起来了，办法就有了。革新项目一经实现，就可以克服薄弱环节，使生产前进一步。我厂中型铣床大件加工，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是生产中的“短线”，月产一百多台，是我厂进一步提高产量的薄弱环节。一九七〇年，加一车间的职工，发扬“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精神，改工艺、改工具、向大洋设备开刀，实现了以铣代刨等革新，在基本上不增人、不增设备的情况下，中型铣床大件加工达到月产五百台的水平。这个单位主动了，我们又重点发动其他单位大搞革新。先进促落后，一环推一环。就这样，抓住一点，带动一片，推动了全厂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保证了生产的持续发展。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纷纷投入技术革新的战斗。但是，技术革新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是等别人给创造条件，还是学习大庆的革命精神，没有条件尽可能自己创造条件，这是技术革新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应该具备的，外援也要积极去争取，但是，改变生产技术面貌，首先



要靠群众自己起来革命。广大职工说得好：“一要二等三落空，一想二千三成功”，必须主动地去创造条件，改变条件。

要把自力更生的正确方针落实到基层，必须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坚信工人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材料不足，就挖企业内部潜力，清仓查库，充分利用多余、废旧物资，或将产品改革节省下来的材料用于革新项目。没有厂房，就在原有厂房基础上，因地制宜，见缝插针。配套件不够，就组织厂内外协作，互相调剂支援。设备紧张，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或利用星期天和夜班借空余床子干。技术力量薄弱，就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在费用方面，则坚持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做到精打细算，合理安排。木模工段过去主要使用手工工具。在品种发展、产量翻番以后，木模的制造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木模工人克服了“木模工只会吃木头，吃钢铁没咒念”的想法，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边学边干，在兄弟单位支援下，先后自制大型木工龙门铣、齐头机、拼缝机等设备二十六台，在不增人的情况下，满足了生产需要。为了支持群众革新技术的战斗，我们要求有关科室对技术革新所需要的物资，尽力给予满足，为群众性技术革新积极创造条件。这样，就使广大群众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技术革新。几年来，设备有改有创，革新由小到大，队伍由弱到强，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

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是变革旧的生产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技术的过程，是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和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体现。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要经过艰难曲折。在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中，有的成功了，也有的失败了；有的顺利一些，也有的走了许多弯路；有的效果很理想，也有的开始很不完善，甚至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革新一次成功，不许失败，没有反复，这不是科学态度。这样，必然会对新生事物泼冷水，压制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发展。在新和旧、变革和保守、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领导必须态度鲜明，积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才有利于推动技术革新群众运动的开展。过去，我厂万能铣的主轴一直是用钢材锻造的，为了节约钢材，工人群众提出改用球墨铸铁，我们热情支持了群众的倡议。新材料投产后，有一段时间，质量不稳定，影响到生产任



务的完成。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动摇，要求恢复旧材料。我们认为，改用新材料方向是对头的，应当坚决支持，但它需要一个掌握和巩固的过程。于是，积极组织工人和技术人员团结攻关，并取得有关研究机关的大力帮助，反复进行科学试验，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每年可节约钢材一百五十吨。加二车间的职工为了提高精密铸造的效率，一九七一年自制压蜡机代替手工作业，但是没有成功。一九七三年又设计制造一台卧式压蜡机，也失败了。这时有人吹冷风，认为是白浪费。我们认为，通过实践可以取得经验，不能怕交“学费”，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节约，反对浪费，但决不能把群众技术革新中交的“学费”当作“浪费”来反对。毛主席在谈到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曾指出：“**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全局的问题是这样，局部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要争取少交一些“学费”，但一点不交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领导承担了责任，鼓励群众总结经验，坚持革新，一九七四年，终于制成了十二工位自动压蜡机，生产效率提高三倍。

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开展起来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使运动持久地发展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体会是：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三结合革新队伍的作用，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与专业队伍的技术革新结合起来。这样，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总结群众的经验，使技术革新成龙配套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又可以更好地培养一支技术革新的队伍。装配车间三结合革新小组总结群众经验，一九六九年以来，全面规划，自制了二十一台导轨磨等专用设备，使万能铣五十九个精加工面全部采用精磨、精刨、精铣，代替了手工刮研，减轻了劳动强度，效率提高三、四倍。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是不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是个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认真贯彻“**鞍钢宪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就一定能更快地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贡献。



新厂也需要搞技术革新

天津市第一石油化工厂党委会

我们厂是一九七〇年建成投产的。四年来，我们这个新厂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工人阶级，在新设备上实现了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一百五十多项，炼油能力从原设计的年产三十万吨提高到四十五万吨。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又实现重大技术改造十二项，炼油能力提高到六十万吨，产量翻了一番。四年来，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品种由五种增加到十一种，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可以建设四个相当于我厂现在规模的炼油厂。我们体会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广大工人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在迸发出来，这是推动技术革新迅猛发展的巨大力量。我们企业领导必须不断端正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和智慧更好地组织起来，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我们厂的技术革新是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的。

一九七〇年，我厂常减压炼油装置投产，当年就达到了设计能力。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在三十万吨上停步，还是从设计能力的框子中迈出去？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我们应当继续前进，向技术革新要油，为国家多作贡献。但也有的同志认为，新装置刚投产、新设备刚运转、新工艺刚掌握，搞革新得等些年。为了统一认识，我们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指出：“在生产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



都是错误的。”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科学地概括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人们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批判了各种错误观点，是我们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新设备就不能够变吗？就不需要搞技术革新吗？不是。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对于新设备也要用发展的观点看。设备，和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时候，新与旧都是相对的；没有变革，也就无从区别新和旧。从这个意义来说，昨天的新，是今天的旧；而今天的新，明天也会变成旧。新设备的不断改造，是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那种认为新设备不用革新和改造了，不能再发展了，是一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厂的设备能力的发挥，也正是在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实现的。大家回顾建厂初期，就曾经对原设计作过很多局部的修改。比如，仪表工人修改过空压站信号电缆的设计，泵房操作工人修改过排水管道的设计，等等。投产后不久，有的车间又对加热炉等设备进行了改造。原来加热炉有两套燃料系统，一套和蒸汽锅炉同用，互相影响，不易操作；一套用减压塔底的燃料油，由于油位高低不稳，塔底泵容易抽空，造成炉子熄火，操作波动很大。后来，革新了工艺，搞了一套自备燃料系统，从而平稳了生产操作，增大了设备效能，提高了炼量收率。这些设备经过改革，比原设计更加符合生产实际，更加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

这些事实对大家启发很大。它说明了，新设备是需要改造的，也是完全能够改造的。只要从思想政治路线上端正认识，把敢于改革的雄心壮志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让新设备遮住眼，挡住道，就能发现新设备同生产发展不相适应的薄弱环节，不断进行技术革新。

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我们厂老工人少，新工人多，充分发挥青年工人的智慧和力量，组织他们积极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同志认为：“青年工人现在能顶好岗位就不错了，搞革新、搞改造还不到时候。”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



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我们看青年工人，首先就要看到这个突出的本质特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一味强调青年工人不稳当、经验少、技术差，不相信他们能够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我们厂的情况看，建厂初期，就组织青年工人到大庆实习，受到了大庆精神的教育，从思想上打下了一个好底子。随后，他们又亲身参加了艰苦的建厂劳动，在老工人带领下，安装了绝大部分仪表和机泵，不仅体会到创业的艰难，而且对新设备的性能也有一定的认识。投产以后，他们整天战斗在生产岗位上，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党委在抓好路线教育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技术教育。由于他们肯学习，在短短一两年里进步很快，已成了革命和生产中的一支生力军。

在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过程中，青年工人富有创造性，敢想敢干，提出了许多好的革新建议，对工艺和设备进行了许多革新和改造。仪表车间两个青年女工，在老工人帮助下，克服了技术资料缺乏等困难，完成了水场仪表盘配线敷设任务。他们安装的仪表盘同苏修的仪表盘相比，既省料，又美观适用。油品车间沥青工段百分之九十是一九七〇届初中毕业的青年。这个工段原是手工操作，生产效率较低。他们同机修工人密切配合，自己动手，大搞革新，把单釜氧化改成了双釜连续氧化，推车扒桶改成了成型包装机械化，使沥青产量由原设计的年产七千吨提高到两万五千吨。在设备改造会战中，青年工人提出了不少革新建议，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炼制车间青年工人改进柴油碱洗工艺的基础上，油品车间的青年工人，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采用了鼓风加速沉降的方法，基本上解决了柴油透明度的问题。原来，轻柴油要在罐里沉降二十多天还不能合格出厂。现在，最多沉降一、两天就可以合格出厂，扭转了生产上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

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是一项复杂的艰苦劳动，对于新工艺、新设备的革新和改造尤其如此。要搞好这项工作，必须学会和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在开始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时，我们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从哪里下手？我



们从实践中体会到，要集中力量抓好关键部件、关键工艺的改革。毛主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也是这样。每套设备、每个工艺流程，都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但其中必有一个是最主要的薄弱环节，也就是“卡脖”的地方。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就能带动整个设备、整个工艺的改造，收到显著的效果。比如，一九七一年我们进行提高炼量的试验，新设备暴露了许多矛盾：有些设备超过了负荷，有的热源不足，某些加工工序提不上去，等等。这么多的矛盾先解决哪个好？全厂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分析，抓住了初馏塔控制温度低、常压炉负荷大这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大家一齐动手，出主意，想办法，相应地改革了工艺，降低了常压炉的负荷，解决了热源的问题。改造后，初馏塔顶拔出率提高一倍，使原油的日加工量提高了一百多吨。

解决了“卡脖”的矛盾，是不是就“一锤定音”，完成了革新和改造的任务呢？不，不是这样。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因而旧的改造过程结束了，新的改造过程又开始了。一九七一年改造常压炉之后，又发现减压炉成为进一步增产的障碍，紧接着我们又着手改造减压炉，并对系统装置进行了革新和调整。经过不断革新和改造，使炼油能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这时有人认为热源用尽，潜力挖尽，产量不好再提高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家冲破了这种思想阻力，继续努力，调整了冷换设备，改造了炼塔结构，挖掘了热源，结果炼油能力又由四十五万吨进一步提高到六十万吨。

事实教育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任何时候，设备上、工艺上都会有矛盾，都会有效能差别，都会有不平衡，因此设备的改造、技术的革新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新厂搞技术革新具有广阔的前程，大有文章可做。我们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团结全厂职工，进一步搞好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使炼油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贡献。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

——上海中国电工厂的调查报告

上海中国电工厂是一个专业生产漆包线的工厂。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这个厂的广大职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没有要国家投资，没有靠建新厂房和向国家要新设备，而是立足于现有基础，自己动手，开展技术革新，在全国二十多个兄弟工厂、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协作下，今年三月份以来，自己设计、制造出十五台催化燃烧漆包机，将原有的漆包车间改造成为全部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的新车间。催化燃烧漆包，在国外是六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新技术。这个厂制造的新设备，有多层、多线轴、高速的特点，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新车间投产后，可使漆包线的产量，在比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增长三倍的基础上再增长一倍，质量进一步提高，并节约用电百分之六十以上。采用新技术后，漆包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废气也可回收燃烧，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三废处理问题。过去有人曾计算过，单设计一台新式漆包机，需要半年，如果改造一个车间，至少要三、四年。而这个厂只花了半年时间，就把新车间建立起来了。它说明，毛主席制定的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最能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最能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群众掌握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就会在技术革新中迅速改变生产技术面貌，创造出又一个奇迹来。

批林批孔 长自力更生的志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多快好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批判和清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树立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开展技术革新的强大动力。

漆包线是机电、仪表等工业不可缺少的材料，被称为“电机的血管”、“仪表的



神经”。原来的漆包机，是在铜线上涂绝缘漆，再用电热烘干，耗电量大，是有名的“电老虎”。烘干时，溶剂中的苯、酚等有害气体大量散发，污染环境。过去，广大工人也曾要求改革技术，试验和制造催化燃烧新技术、新设备，可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只靠少数技术专家关门查文献资料，计算数据，一无结果。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我国工业生产和科研事业的迅猛发展，不仅对漆包线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而且对质量、品种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但是，产量、品种上去了，耗电量也大量增加，有害废气增多，成了生产发展中的尖锐矛盾。批林整风运动中，广大工人批判了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提出要把过去没有搞成的催化燃烧漆包新技术攻下来，并且组织了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试验小组。开始，有的人不相信工人能够造出先进的漆包机，热衷于要从国外进口设备。厂里有的领导干部也担心，这种新技术很复杂，能不能攻得下来。还认为，文化大革命后生产已翻了几番，达到了先进水平，眼前还过得去，因此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技术革新进展不快。

广大群众要求革新技术，但洋奴哲学的修正主义影响造成了严重的阻力；安于现状，无所作为的思想又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只有用自力更生的思想武装群众，才能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广大工人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进一步认清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大大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们听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封锁、垄断新技术，而且还用高价、专利权卡我们，进口一台催化燃烧漆包机的价格，就等于这个厂固定资产的一半。大家憋着一肚子气，坚决表示，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自力更生，开展技术革新，造出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争气机”。他们在学习和批判中，还回顾这个厂的发展史，总结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所取得的成就，把洋奴哲学批得无处藏身。这个厂原是由十七个小厂合并起来的。起初，生产漆包线全靠手工操作。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工人们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跳出仿造外国设备的框框，造出一百二十一台成套的简易拉丝机、漆包机，工人叫它“跃进机”，还编了一首顺口溜：“走进电工厂，遍地土设备，大的象楼房，小的桌上放，配套又成龙，土法显威风。”工人说：“过去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改变了生产的落后面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物质条件改善了，更应该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掌握最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大家总结出一条基



本经验：满足现状，畏难保守，迷信洋人，搞爬行主义，就会灭我们工人阶级的志气；只有自己动手，用新技术、新设备武装自己，才能大长工人阶级的志气。通过学习、批判，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大发扬，搞技术革新的信心越来越足。

敢闯敢创 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任何新技术，都是在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对于它的发展规律，也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实践，才能认识它，掌握它。敢不敢闯，敢不敢创？这是能不能把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到技术革新活动中，发挥出巨大威力的一个重要问题。

催化燃烧漆包机，包括催化燃烧和热风循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即通过催化剂使绝缘漆中蒸发出来的大量有机溶剂加快燃烧，同时把燃烧时产生的巨大热量通过循环系统来烘干漆包线。这样既可以节约用电，又可以通过燃烧把有害气体变成无害的水和二氧化碳，避免污染。但怎样催化，怎样燃烧？燃烧后又怎样把热量收集起来，重新送到漆包烘炉里，生产出高质量的漆包线？这中间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一些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有盲目崇洋思想的人，被这一系列的难题难住了，动也不敢动。可是，中国电工厂的工人认为：催化燃烧技术规律既然是客观存在，只要敢于去碰它，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总是可以掌握的。工人们从搞小样开始，再搞模拟试验，先后经过八十六次试验，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剥去了这门新技术的神秘外衣。例如，催化燃烧区是催化燃烧漆包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搞模拟试验时，催化区烧了一会就不烧了，有害气体从出口处冒了出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开始，他们用鼓风机把出口封住，想把冒出来的烟压回去，可是越压，烟冒得越厉害。工人们毫不气馁，总结经验再干，他们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了打开催化燃烧秘密的钥匙。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这个辩证思想启发了工人。要不冒烟，不能压，而要“放”。燃烧是氧化反应，要有新鲜空气。他们撤掉了出口的鼓风机，并加大了进口鼓风机的风量，催化区的新鲜空气多了，反应充分了，越烧越旺，有害气体基本上都烧掉了，就自然不冒烟了。这个厂的工人就是这样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终于逐步掌握了这项新技术。

国外有先进技术，我们也有先进技术。发展新技术，要从我们的生产实际出



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出中国式的新技术、新设备，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电工厂试制催化燃烧漆包机，开始是两层烘箱、十六个线轴，生产效率还不高。而这个厂在大跃进中创制的电热漆包机，有七层烘箱、五、六十个线轴，效率较高。能不能把现在掌握的催化燃烧新技术和过去自己创造的多层、多线轴、高速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制造出有七层烘箱、五十个线轴的催化燃烧漆包机呢？当时，有人吹冷风，说这种漆包机国外还没有，要想造这种技术更复杂、要求更高的机器，简直是空想。工人们回答：国外有的，我们也要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才叫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工人群众的建议，党总支召开了有几十位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诸葛亮会议”，一连开了三天三夜，讨论技术方案。会上，七嘴八舌，献计献策。广大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发挥出来了，一个个技术难题解决了，这种催化燃烧漆包机也就造出来了。目前，国外一种被称为先进的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结构非常复杂，形态也很笨重，工人笑它是“笨头笨脑，张牙舞爪”。中国电工厂的工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使用了新的冷却方法，大大简化了机器结构，只使用五个电动机，三个鼓风机，四个阀门。如果按照国外的设计、用料，仿造一台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需要二、三十万元，而中国电工厂制造的同样一台机器只要四万多元，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还要立足于本国的资源条件。催化燃烧漆包机的一种关键材料，是催化剂。国外采用白金和其它贵金属，价格昂贵。如果采用这种催化剂，就是整个设备搞成功了，也难以推广。这个厂的工人决心把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到底，不搞半截子革命。他们到处访问求教，进行各种试验，找到一种新的担体催化剂，这种催化剂我国资源丰富，价格很低。在用料方面，工人们也打破洋框框。为了适应高温，国外制造这种设备都用不锈钢材。中国电工厂工人经过测定分析，除在催化区使用不锈钢材外，其他部件都用普通钢材，仍然可以达到技术要求，使不锈钢材的用量只及国外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为推广这种新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事例说明，广大工人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自力更生的方针打开了这个丰富的宝藏，就使他们的智慧放出更大的光彩。

争取时间 使技术革新之花迅速结果

通过批林批孔，自力更生方针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技术革新活动也就热气腾腾，进展迅速。原来，这个厂的领导计划今



年国庆节前试制出新的催化燃烧漆包机，明年再逐步推广。可是，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坚决要求大干、快上，把技术革新成果早日用于生产，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他们说：争气就要争在时间上。我们不仅要造出几台样机，而且要用新技术、新设备，改变整个车间的面貌。

“批了林彪和孔丘，革命干劲估不透”。一台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有十吨重，四层楼房高，仅制造就需要一千六百多人工。改造漆包车间，要把原来十二台老设备拆掉，换上十五台新设备，需要二、三万个人工。而整个机修部门能够投入的人力只有八十多人，一年也干不完。设备、场地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多困难。可是，用自力更生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人，有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迎着困难上。担任设计绘图的原来是个钣金工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认识到造的是“争气机”，打的是政治仗，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主动到现场去，和工人们一起商量，在大家帮助下，只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就画好了平常需要四个月才能画好的全部图纸。制造设备没有场地，工人们在车间外面的走廊、过道里，用油布搭起十几处临时工作棚，到处摆开了战场。劳动力不足，各车间主动抽出生产工人支援，并且打破工种界限，人人学做多面手，钣金工人能做电焊工，研磨工人能做车工，连泥木工也上了机床。生产工人下班后也纷纷参加义务劳动，全厂几乎每个人都为技术革新出了一把力。设备能力不足，工人们简易上马，想出许多穷办法、巧办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他们接连打了三仗，一次比一次打得漂亮。第一仗，以四十七天时间，造出一台卧式七层烘箱的催化燃烧漆包机；第二仗，八天八夜，造出了一台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第三仗，又以三个多月时间，建设成功一个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新车间，使生产技术面貌焕然一新。九月底，大部分新设备开动起来了，不仅把脱下的任务补上，完成了九月份的生产任务，而且比原计划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毛主席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从中国电工厂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能把生产技术不断推向更高的水平，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调查组



· 杂 文 ·

呾 语

阳 戈

最近，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又发出了反华叫嚣。除了重弹中国走上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按：应当加上帝国二字，即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道路”的老调之外，还用了一个新词，叫做要把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页历史“翻过去”（见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其真实用意，就是煽动一小撮反动分子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然而，这不过是勃列日涅夫的呾语。想当初，苏修叛徒集团曾寄希望于刘少奇，想通过他的手，把中国社会主义“翻过去”。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迷梦破灭了。这件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大好事，在勃列日涅夫面前成了“大悲剧”。后来，又寄希望于林彪，想通过他的手，把中国社会主义“翻过去”。这个“超级间谍”没来得及说出“决定性的话”，就一个筋斗翻在温都尔汗，迷梦又一次破灭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强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是翻不过去的。谁要想“翻”，谁就要变为齑粉。苏修叛徒集团是反动派；他们对事情的估量，一向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接受这些历史教训，也不会因此就改弦更张。他们依然做梦也想把中国社会主义“翻过去”。果不其然，这次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

勃列日涅夫的呾语，对我们也有点用处。他再一次从反面告诉我们，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总想在我国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妄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要捣乱到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我们切不可因为胜利了而丧失警惕。

勃列日涅夫的呾语，正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的处境。苏修叛徒集团，不但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在国内，他们也正坐在反对修正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火山口上。它熔岩欲出，随时都可能爆发。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定要也一定会把修正主义统治的黑暗的一页彻底“翻过去”。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